



大会

Distr.: General
30 May 2014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国际法委员会

第六十六届会议

2014年5月5日至6月6日和
7月7日至8月8日，日内瓦

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初步报告

特别报告员：玛丽·雅各布松

目录

	页次
一. 导言	3
二. 该专题列入委员会工作方案和委员会先前磋商的情况	4
三. 大会第六委员会在第六十八届会议(2013年)上的辩论情况	5
四. 对委员会特别想听取意见的具体问题的回应	7
五. 各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实践	8
六. 本报告的宗旨	14
七. 在委员会和联合国以往讨论的基础上对该专题范围、方法和结果的一些反思	16
八. 术语的使用	18
九. 需要参考的来源和其他材料	22
十. 与国际法委员会其他专题的关系，包括与本届会议议程上其他专题的关系	23
十一. 环境原则和概念	28



十二. 人权与环境	38
十三. 今后工作方案	41
附件	
参考文献.....	43

一. 引言

1. 人们早已认识到，在武装冲突期间和之后发生的环境影响可能严重威胁具体个人和社区的生计，甚至威胁其生存。与武装冲突的许多其他后果不同，对环境的危害可能是长期的和不可弥补的，这种危害可能阻碍有效地重建社会，破坏原始地区，破坏重要生态系统。¹

2. 迄今为止，主要是从武装冲突法角度看在武装冲突中保护环境问题。但是，这个角度过于狭窄，因为现代国际法承认，在武装冲突期间适用的国际法律可能比武装冲突法更广泛。国际法委员会在最近关于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的工作中也承认这一点。这项工作的起点是，推定存在武装冲突并不当然终止或中止条约的运作。²

3. 鉴于与武装冲突相关的适用法律显然超出武装冲突法律范围，为了找到解决具体法律问题的办法而将国际人道主义法视作特别法有时是不够的。或许还应适用国际法其他领域的法律，比如国际人权法和国际环境法。国际法院承认这一点——尽管没有详细阐述一套规则何时优先于另一套规则：

更广泛地说，法院认为，除《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四条规定的克减外，人权公约提供的保护在武装冲突中并没有停止。因此，关于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之间的关系，存在三种可能的情况：一些权利可能是专属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事项；一些权利可能是专属人权法的事项；还有一些权利可能是属于国际法这两个分支的事项。法院为了回答向它提出的问题，必须考虑国际法的这两个分支，即人权法和作为特别法的国际人道主义法。³

4. 国际法院在关于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的咨询意见中也认为，战时还必须考虑环境因素：

因此，法院认为，虽然有关保护和维持环境的现有国际法律没有明确禁止使用核武器，但这种法律显示，在执行适用于武装冲突的法律原则和规则时，必须适当考虑重要环境因素。⁴

法院在作出这一结论时回顾了法院在“请求依照 1974 年 12 月 20 日在核试验案(新西兰诉法国)中所作判决的第 63 段对情况进行审查”案的命令中作出的结论，法院在命令中指出，它的结论“不影响各国尊重和保护自然环境的

¹ 见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报告(A/66/10)附件 E 所载专题大纲。

² A/66/10，第 100 段，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条款草案第 3 条。

³ 《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后果》，咨询意见，《2004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136 页，第 106 段。

⁴ 《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咨询意见，《1996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226 页，第 33 段。应该强调指出，本专题感兴趣的是法院的总体结论：“在执行适用于武装冲突的法律原则和规则时，必须适当考虑重要环境因素”，不是法院对某项具体武器的审议情况。

义务。”⁵ 法院表示，“虽然结论涉及的是核试验，它自然也适用于在武装冲突中实际使用核武器的情形”。⁶ 还应该指出，国际法委员会在关于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等工作中也承认国际法院推理所依据的假设。⁷

5. 即使假设在武装冲突期间仅适用武装冲突法，该法律也包含了与武装冲突之前和之后采取的措施相关的规则。因此武装冲突法并不局限于武装冲突本身。因此，特别法(武装冲突法)的适用规则与国际法其他规则是并存的。⁸

6. 似乎没有任何国家或司法机构对平行适用人权法、难民法和环境法等国际法不同分支提出质疑。但如何确切地适用国际法的这些领域，各国和各司法机构也没有定论。关于如何平行适用这些法律，或断定何时特别法明显优先，是唯一的适用法律，各国和各司法机构采取了慎重态度，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与此同时，有必要分析这种不确定性，并得出结论。

7. 近四十年前制定关于武装冲突中保护环境的具体规则(即《1976 年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的公约》和《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⁹)以来，法律和政治格局已经发生变化。当时，国际环境法处于萌芽阶段。而且，当时的武装冲突性质不同，即：大多数冲突属于国际冲突或解放战争，而今天，最常见的是不同性质的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在这种新的现实情况中适用现有法律可能有些难度。

二. 该专题列入委员会工作方案和委员会先前磋商的情况

8. 在上述背景下，委员会在其第六十三届会议(2011 年)上决定将“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专题列入其长期工作方案。¹⁰ 该专题是根据委员会这届会议工作报告附件 E 转载的提议¹¹ 列入的。大会在其第 66/98 号决议第 7 段表示注意到委员会将该专题列入了其长期工作方案。

⁵ 请求依照 1974 年 12 月 20 日在核试验案(新西兰诉法国)中所作判决的第 63 段对情况进行审查，《1995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288 页，第 64 段。

⁶ 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咨询意见，《1996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226 页，第 243 段。

⁷ 国际法委员会研究组关于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国际法多样化和扩展引起的困难的报告(A/CN.4/L.682)。

⁸ 同上，第 173 段。

⁹ 1976 年 12 月 10 日《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的公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108 卷，第 17119 号)和 1977 年 6 月 8 日《1949 年 8 月 12 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第一议定书》)(同上，第 1125 卷，第 17512 号)。

¹⁰ A/66/10，第 365 至 367 段。这意味着该专题符合委员会建议的选择专题标准。见《1998 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00.V.11 (Part 2))，第 553 段。

¹¹ A/66/10，附件 E。

9. 委员会在其第六十五届会议(2013年)上决定将“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专题列入其工作方案,并决定任命玛丽·雅各布松女士为该专题特别报告员。

10. 在该专题列入委员会长期工作方案后,委员会在2012年第六十四届会议期间开始以非正式磋商的形式审议该专题。2012年进行的非正式磋商让各成员有机会陈述关于该专题的意见。非正式磋商显示,成员们赞成将该专题列入委员会议程,没有任何成员反对列入该专题。

11. 委员会在其第六十五届会议(2013年)上进行了更具实质性的非正式磋商。这些初步磋商使委员会成员有机会反思并谈论今后的工作方向。讨论的工作内容包括范围和总的方法,包括将工作划分为时间段,以及今后工作的时间表。设想的时间框架为三年,每年提出一份报告,供委员会审议。

12. 特别报告员在非正式磋商的基础上向委员会提出了口头报告,委员会表示注意到该报告。¹² 委员会还商定,将请各国提供实例,说明在国际性或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期间继续适用国际环境法、包括继续适用区域和双边条约的情况。¹³

三. 大会第六委员会在第六十八届会议(2013年)上的辩论情况

13. 在大会第六委员会第六十八届会议期间,约三十个国家谈到该专题,而且他们是在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五届会议(2013年)工作报告(A/68/10)的基础上谈论该专题的。¹⁴ 大多数国家明确表示欢迎列入该专题,若干国家作了实质性发言。¹⁵ 在辩论中发言的三十个国家中,只有两个国家对决定列入该专题表示疑虑。¹⁶ 也有国家对该专题的范围以及其影响可能远远超出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专

¹² A/68/10, 第133段。磋商于2013年6月6日和7月9日进行。

¹³ A/68/10, 第三章,委员会特别想听取意见的具体问题,第28段。

¹⁴ 这些国家是:奥地利、比利时、古巴、捷克共和国、芬兰(代表北欧国家(丹麦、芬兰、冰岛、挪威和瑞典)、法国、希腊、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爱尔兰、意大利、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秘鲁、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新加坡、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瑞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可在下列网址查阅发言:<https://papersmart.unmeetings.org/ga/sixth/68th-session/agenda/81>。不过,本报告仍遵循委员会惯例,引述辩论的简要记录。

¹⁵ 例如:奥地利(A/C.6/68/SR.23,第68段)、古巴(A/C.6/68/SR.25,第70段)、芬兰(代表北欧国家)(A/C.6/68/SR.23,第44段)、希腊(A/C.6/68/SR.24,第46段)、伊朗伊斯兰共和国(A/C.6/68/SR.26,第8段)、意大利(A/C.6/68/SR.24,第2段)、马来西亚(A/C.6/68/SR.25,第29段)、墨西哥(同前,第17段)、新西兰(A/C.6/68/SR.24,第102段)、葡萄牙(A/C.6/68/SR.17,第86段)和南非(A/C.6/68/SR.24,第24段)。

¹⁶ 俄罗斯联邦认为,“国际人道主义法已有足够的条规”,而且“武装冲突之前和之后的时期应视为平时时期,应充分适用保护环境的一般规则”(A/C.6/68/SR.25,第47段)。法国“重申先前对开展关于这个问题的工作的可行性表示的疑虑”(A/C.6/68/SR.17,第105段)。

题的风险表示关切，¹⁷ 一个国家认为，在这个法律领域，应该采取逐步发展的办法。¹⁸

14. 整体而言，各国欢迎分时段方法和总方法。一些国家强调指出，各不同阶段难以切割。¹⁹ 虽然有些国家表示倾向于以哪个阶段为工作重点，但无法得出具有普遍性的结论。一些国家明确强调，第二阶段(应在武装冲突期间采取的措施)不应该是工作的重点，因为已经存在处理武装冲突情况的规则和原则。一些国家²⁰ 欢迎并强调必须既处理国际性武装冲突也处理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一些国家表示，应该处理难民法或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对环境造成的影响。²¹ 一些国家讨论了是否应该处理武器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各方表达了不同意见。²² 一个国家希望委员会处理排雷问题。²³ 另一该国家强调，必须考虑环境损害赔偿问题。²⁴ 一些国家还强调了战争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²⁵ 一个国家希望列入文化财产的保护议题。²⁶

15. 若干国家谈到该专题工作的可能结果，并表示倾向于提出准则草案，而不是条款草案。²⁷ 有两个国家表示，这不是一个适合起草公约草案的专题。²⁸ 但另一方面，一个国家认为，如果能够制定条款草案，则将体现委员会该专题工作的丰硕成果。

¹⁷ 美国(A/C.6/68/SR.23, 第 54 段)。

¹⁸ 马来西亚(A/C.6/68/SR.25, 第 29 段)。

¹⁹ 这个观点与特别报告员(2013 年)在给国际法委员会的口头报告中表达的立场一致，口头报告表示，不同阶段不会有严格的分界线。见 A/68/10, 第 137 段。

²⁰ 奥地利(A/C.6/68/SR.23, 第 68 段)、南非(A/C.6/68/SR.24, 第 28 段)和瑞士(A/C.6/68/SR.23, 第 61 段)。

²¹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A/C.6/68/SR.26, 第 9 段)和南非(A/C.6/68/SR.24, 第 28 段)。

²² 古巴(A/C.6/68/SR.25, 第 70 段)、马来西亚(A/C.6/68/SR.25, 第 30 段)和葡萄牙(A/C.6/68/SR.23, 第 82 段)认为应该处理武器问题，而奥地利(A/C.6/68/SR.23, 第 69 段)、罗马尼亚(A/C.6/68/SR.24, 第 87 段)、新加坡(A/C.6/68/SR.25, 第 114 段)和联合王国(A/C.6/68/SR.23, 第 89 段)则认为不应该列入武器问题。

²³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A/C.6/68/SR.26, 第 9 段)。

²⁴ 新西兰(A/C.6/68/SR.24, 第 103 段)。

²⁵ 秘鲁(A/C.6/68/SR.18, 第 27 段)和南非(A/C.6/68/SR.24, 第 24 段)。

²⁶ 意大利(A/C.6/68/SR.24, 第 4 段)。

²⁷ 印度(A/C.6/68/SR.19, 第 21 段)、意大利(A/C.6/68/SR.24, 第 5 段)和新加坡(A/C.6/68/SR.25, 第 114 段)。

²⁸ 美国(A/C.6/68/SR.23, 第 55 段)和西班牙(A/C.6/68/SR.25, 第 2 段)。特别报告员 2013 年在向委员会陈述该专题时也表示，比较适当的做法可能是为该专题制定无约束力的准则。见 A/68/10, 第 143 段。

四. 对委员会特别想听取意见的具体问题的回应

16. 按照惯例，委员会在其第六十五届会议工作报告中要求提供信息，说明委员会特别想听取意见的一些具体问题。²⁹ 委员会希望：

“各国提供资料，说明在它们的实践中，在涉及国际或非国际武装冲突时，国际或国内环境法是否被解释为适用。委员会特别希望收到以下材料：

- (a) 条约，特别是有关的区域或双边条约；
- (b) 与本专题有关的国内法律，包括执行区域或双边条约的国内法律；
- (c) 对武装冲突局势引起的争端适用国际或国内环境法的判例法。”³⁰

17. 下列国家已对委员会的要求作出回应：博茨瓦纳、捷克共和国、³¹ 萨尔瓦多、德国和墨西哥。

18. 博茨瓦纳告知委员会，它不是处理武装冲突中保护环境问题条约的缔约国，也没有实施关于该事项的任何国内立法。此外，博茨瓦纳告知委员会，国内任何法院都没有处理过该事项。³²

19. 萨尔瓦多的回应³³ 分为三个部分：(1) 在国内一级采取的行动；(2) 在国际一级采取的行动；(3) 在区域一级采取的行动。萨尔瓦多宪法庄严规定，国家有义务保护自然资源以及环境的多样性和完整性，以确保可持续发展。此外，宪法规定，保护、养护、合理利用、恢复或再造自然资源是涉及公共利益的事项。1998年《环境法》进一步体现了这一点，该法律的意图是通过符合可持续经济和社会发展原则的现代法律条文，全面处理环境问题。萨尔瓦多强调，规定的义务是国家、各城镇和广大民众的基本义务；确保萨尔瓦多执行已加入为缔约国的这个领域的国际公约或条约。虽然《环境法》没有明确提到武装冲突中保护环境问题，但该法律宗旨广泛，其中包含各规范性文件所载义务。此外，由于国家在这方面的义务直接来自宪法，可以说，保护环境的义务在任何时候都适用，因为宪法没有任何关于例外或中止适用的条款，即使在武装冲突期间也没有例外，也不能中止适用。

20. 萨尔瓦多的结论是，这反映了安全与环境保护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即使在按最严格定义不属于武装冲突的情形中，这种关系依然存在。这种关系也存在反

²⁹ A/68/10。第 28 段。

³⁰ 同上。

³¹ 2014 年 1 月 31 日捷克共和国常驻代表团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

³² 2014 年 1 月 24 日博茨瓦纳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

³³ 2014 年 1 月 29 日萨尔瓦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秘书处法律事务厅的普通照会。

向效应：对环境的威胁、尤其是自然灾害可能对安全产生负面影响，因为这些威胁和灾害制造紧张局势，并将一些人排斥在外，使这些人别无选择，只能加入武装团体或从事各种犯罪活动。

21. 墨西哥表示，墨西哥签订的双边和多边环境协定没有规定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的具体义务。墨西哥指出，1977 年第一附加议定书禁止使用可能对环境造成严重和持久损害的作战手段，并重申《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原则 24。³⁴

22. 德国提供了关于双边协定的信息，并提供信息，说明联邦环境署 2001 年进行的一项关于军事活动对环境的影响的法律管控的研究，例如，德国指出，“战争对环境同时构成各种威胁，但现有国际法在这方面的保护规定则有限”。³⁵ 德国还告知委员会，《联邦武装部队 2013 年三军武装冲突法手册》论及影响环境的作战方法和手段。³⁶ 此外，德国提供了构成国家关于这个问题的实践的双边协定引文，其中一项是德国与驻科索沃部队(驻科部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的协定，另一项是德国政府与阿富汗政府之间的协定。³⁷ 两项协定分别涉及在部署驻科部队和联邦武装部队期间产生的废物的出口问题。

五. 各国家和各国际组织的实践

23. 除了各国直接应委员会邀请提供的资料之外，特别报告员还通过与各国和国际组织沟通获取了资料。此种资料有助于阅读本报告，因此在以下各节予以介绍。

24. 尽管各国对委员会 2013 年报告所提问题作出的答复数目有限，特别报告员仍深信，很多国家已有着眼于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的立法或法规。首先，军队应受适用于和平时期局势的国家立法制约。武装部队是一个国家实体，很可能与任何其他国家实体一样受相同法律制约，但可能存在武装部队执行具体任务时适用的特别法规。其次，国际法义务和国家限制往往体现在各国武装部队交战规则中。第三，在停止敌对行动之后，和平时期的法规再次成为适用的默认法规。除此之外还有关于清理和恢复的具体法规(例如，清扫雷区)。

³⁴ 2014 年 2 月 26 日墨西哥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国际法委员会秘书的普通照会。

³⁵ Daniel Bodansky, “关于军事活动对环境的影响的法律管控,” 第 5/03 卷, Berichtedes Umweltbundesamts 丛刊(Berlin, Erich Schmidt Verlag 2003), 执行摘要, 第 2 段。

³⁶ 2013 年 12 月 30 日德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

³⁷ 2013 年 12 月 30 日德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普通照会引述的 1999 年 12 月 3 日和 2000 年 2 月 15 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与驻科部队/北约关于从科索沃出口在部署驻科部队期间产生的废物从而在德国以环境友好方式处理的协定，以及 2002 年 7 月 6 日和 2002 年 11 月 9 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与过渡时期阿富汗伊斯兰国政府关于从阿富汗出口在部署联邦武装部队期间产生的废物从而以环境友好方式处理的协定。

25. 特别报告员希望各国针对委员会提出的问题提供进一步资料。同时，国家立法方面的几个实例或许值得一看。

26. 在第六委员会 2013 年的辩论期间，有些国家提到本国立法和(或)环境政策方面的考虑因素。例如，美利坚合众国表示，“美国军方早就把保护环境列为优先事项，其目的不仅是确保维持军事战备所需的土地、水和空域的可用性，而且也为了子孙后代保护不可替代的资源，我们重申，除了纯环境原因外，出于军事、民事、健康和经济等多方面的原因，应当将在武装冲突期间保护环境作为政策事项(着重部分由作者标明)。”³⁸

27. 中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环境保护条例》载有防止和减少环境污染及破坏的规定。该条例还规定了确保在研究和生产军事装备时遵守环境保护要求的义务，以及确保“试验、使用和销毁此类装备，应当采取措施，消除或者减轻对环境的污染和危害”的义务。³⁹ 军队应实行环境影响评估制度，该制度旨在涵盖各种活动，比如组织军事演习、试验军事装备、处理军事废物和工程建设。该《条例》规定的措施看起来针对的是冲突前局势，包括武器试验。这些措施似乎还(部分)满足了《第一附加议定书》的要求。

28. 北欧国家很早就一般在一般性环境问题以及武装冲突期间保护环境的具体问题上开展互动协作。在 2011 年第三十一届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上，北欧国家除其他外承诺“开展并支持一项协调一致的研究，重点强调现有法律框架对在当代武装冲突中保护自然环境的意义，并确定在这方面存在的任何差距。”⁴⁰ 挪威目前正在开展此类研究。⁴¹

29. 作为一般规则，丹麦武装部队必须遵守城市规划、能源和环境等领域的国家立法。不过，存在某些与军队有关的例外情况和具体法规。这方面的例子包括在空军基地和训练区附近安装风轮机，⁴² 在执行危险物质管制令规定时军事大院或军营可例外。⁴³ 在有关环境保护的国家立法中，应提及环境损害赔偿法⁴⁴ 和

³⁸ A/C.6/68/SR.23,第 54 段。

³⁹ 中国 2004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环境保护条例》。

⁴⁰ 承诺 P1290，丹麦、芬兰、挪威和瑞典等国政府以及丹麦、芬兰、挪威和瑞典国家红十字会提交，可查阅：www.icrc.org/pledges。

⁴¹ 挪威外交部已委托奥斯陆国际法和政策研究所开展这项研究。

⁴² 《航空法》，2013 年 8 月 28 日第 1036 号法，第 67 和 68 段，可查阅：www.retsinformation.dk/Forms/R0710.aspx?id=158058。

⁴³ 《风险行政命令》(Bekendtgørelsen om kontrol med risikoen for store uheld med farlige stoffer)，可查阅：www.retsinformation.dk/Forms/R0710.aspx?id=13011。

⁴⁴ 司法部 1994 年 4 月 6 日关于环境损害赔偿的第 225 号法律，可查阅：www.retsinformation.dk/Forms/R0710.aspx?id=59346。

一般环境保护法，一般环境保护法第一条规定，该法旨在促进保护自然和环境，以便社会能够在人类生活条件和动植物养护方面实现可持续发展。⁴⁵

30. 除了国家立法之外，丹麦国防部还有很多关于环境问题的战略和政策规定。环境战略指出，丹麦正在努力确保该国政策符合国际标准化组织(标准化组织)规定的环境标准。⁴⁶ 在 2018 年年底之前，国防部各司在实行环境管理方面应遵守这些标准。⁴⁷ 在国际行动中，武装部队遵守很多关于环境保护的国际标准和规定，比如北约制定的标准和规定。⁴⁸

31. 在芬兰，大部分欧洲联盟和国家一级的环境立法载有一些涉及军队的特别法规。芬兰国防军尽可能遵守环境立法。理论上讲，为了确保环境立法不损害国防的可操作性和灵活性，豁免极为重要。不过，在实践中很少利用此类豁免。豁免的例子包括战斗机的噪音排放以及《废物法》规定的豁免情况。⁴⁹ 特别法规包括关于具体自然保护区的法律和法令允许军方使用这些保护区。⁵⁰ 欧洲联盟一级的一项重要豁免是，《化学品登记、评估、审批和限制条例》给予军用物质豁免。⁵¹

32. 同样，芬兰在开展任何行动或重要军事训练之前都对环境问题和影响进行评估，这是行动规划程序的一部分，而且，芬兰遵守北约现有《标准化协议》，这些文件详细规定了应该如何开展此类规划。⁵² 此外，在部署到国际行动之前开展环境基线研究。⁵³

33. 芬兰发布并定期延长《社区和环境战略》，这是芬兰国防部战略的一部分。芬兰国防军和国防管理局建筑部门均根据标准化组织准则制定了自己的环境政策。有些卫戍部队拥有经认证的标准化组织环境管理制度，整个管理局都遵守标准

⁴⁵ 《环境保护法》，2010 年 6 月 26 日第 879 号法律，可查阅：www.retsinformation.dk/Forms/R0710.aspx?id=132218。

⁴⁶ 国防部，2012-2015 年环境与自然战略(Forsvarsministeriets miljø og naturstrategi)，第 17 页，可查阅：www.fmn.dk/temaer/klimaogmiljoe/Pages/Klimaogmiljoe.aspx。

⁴⁷ 国防部，2012-2015 年环境与自然战略，第 17 页。

⁴⁸ 关于北约环境标准和政策的更多资料，除其他外，见 www.nato.int/cps/en/natolive/topics_80802.htm。

⁴⁹ 《废物法》(Jänelaki/Avfallslag),646/2011，可查阅 www.finlex.fi/en/laki/kaannokset/2011/en20110646。

⁵⁰ 芬兰国防部与特别报告员之间的电子通信。

⁵¹ 见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关于《化学品登记、评估、审批和限制》的欧盟委员会第 1907/2006 号条例，该条例设立了欧洲化学品署，修订了第 1999/45/EC 号指示，撤销了欧洲理事会第 76/769/EEC 号指示和欧洲联盟委员会第 91/155/EEC、96/105/EC 和 2000/21/EC 号指示，OJ L 396,2006 年 12 月 30 日，第 1 页，第 2 条第(3)款(在因国防需要而必须给予某些物资豁免的具体情形中，《条例》给予适用豁免的范围)。

⁵² 比如，见 7141 号标准化协议(第 6 版)，关于在北约领导的军事活动期间保护环境的北约联合原则。

⁵³ 芬兰国防部与特别报告员之间的电子通信。此外，还应该指出，芬兰外交部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维持和平行动中保护环境领域工作的主要资助方。

化组织标准。芬兰国防军还制定了环境保护战略执行计划，⁵⁴ 并在近期系统制定了射击场和重武器射击区环境保护措施。⁵⁵ 此外，国防部还定期发布环境报告。⁵⁶

34. 挪威发布了武装部队环境保护手册⁵⁷ 和关于同一专题的行动计划。⁵⁸ 在后一出版物中，挪威国防部指出，由于很多环境问题具有跨境特征，因此必须找到跨国境的共同解决办法。⁵⁹ 由于参与国际维持和平行动，还必须在制订环境保护框架和目标方面开展合作。⁶⁰

35. 根据挪威武装部队的环境管理政策，环境因素应纳入所有规划和决策过程。⁶¹ 武装部队的环境政策建立在标准化组织关于该专题的标准的基础上。⁶² 此外，武装部队建立了一个环境数据库，各部队应不断向该数据库报告所有可能影响环境的活动、产品和服务。⁶³

36. 挪威武装部队曾在因资源稀缺而发生冲突的地区开展行动，并在手册中指出，气候变化今后可能继续影响武装部队在受资源稀缺影响的地区的行动中开展的工作，或与源于此类地区的难民流有关的工作。⁶⁴ 因此，为了了解眼前冲突的背景以及避免这些地区的环境状况恶化，武装部队必须对全球和当地环境变化及环境状况有充分的认识。⁶⁵

37. 手册提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就战争对环境的有害影响开展了很多研究，并指出，挪威武装部队在驻外期间不应该降低当地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价值。如挪威的规定与行动区的规定存在分歧，应尽可能适用最高标准，同时考虑到行动需要和其他相关条件。不过，手册也指出，很难充分了解外国的当地环境状况，

⁵⁴ Matias Warsta 编，《欧洲国防与环境会议的会议记录》，赫尔辛基，2013 年 5 月(赫尔辛基，芬兰国防部，2013 年)，第 165 至 172 页。可查阅 www.defmin.fi/files/2608/Conference_proceedings_web_2013.pdf。

⁵⁵ 芬兰国防部估计，截至近期，环境保护投资中仅用于研发和设施开发的投资每年就大约有 600 万至 700 万欧元。芬兰国防部与特别报告员之间的电子通信。

⁵⁶ 比如，见 2010 年至 2012 年期间报告(芬兰文)，可查阅：www.defmin.fi/files/2585/Puolustushallinnon_ymparistoraportti2010_2012.pdf。

⁵⁷ 挪威武装部队，Håndbok, Miljøvern i Forsvaret, 2013 年 10 月 31 日。

⁵⁸ 挪威国防部，Handlingsplan - Forsvarets miljøvernarbeid。

⁵⁹ 同上，Handlingsplan - Forsvarets miljøvernarbeid，第 27 页。

⁶⁰ 同上。

⁶¹ 挪威武装部队，Bestemmelser for miljøvern til bruk i Forsvaret, 奥斯陆，2011 年 3 月 21 日，第 3.1 段。

⁶² 给予标准化组织环境保护标准的更多资料，见标准化组织，环境管理：ISO 14000 国际标准体系，可查阅：www.iso.org/iso/theiso14000family_2009.pdf。

⁶³ 挪威武装部队，Bestemmelser for miljøvern til bruk i Forsvaret，第 3.3 段。

⁶⁴ 挪威武装部队，Håndbok. Miljøvern i Forsvaret，第 17 页。

⁶⁵ 同上。

因此建议，应当咨询当地环境机构或掌握关于这一专题的相关资料的其他行为体，从而对特派团进行调整，以尽可能适应当地状况，并避免破坏环境。⁶⁶

38. 挪威于 2005 年禁止使用含铅子弹，并签订了一项在军事演习场地淘汰含铅弹药的自愿协定，这是该国减少有毒化学品工作的一部分。⁶⁷

39. 瑞典武装部队必须遵守瑞典国家立法，即 1998 年《环境法》、其他国家立法、环境许可证和内部规定。环境许可证可根据《环境法》颁发，一般由适当的省级行政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⁶⁸ 每名部队指挥官亲自负责确保环境许可证中规定的条件得到正确遵守。⁶⁹

40. 瑞典、芬兰和美国武装部队发布了环境保护手册和联合工具箱。⁷⁰ 这些材料强调防止破坏环境的重要性，例如，通过对自然环境可能受到破坏的风险进行评估防止破坏环境。工具箱的重点是以下技术专题：固体废物管理；危险材料和危险废物管理；水和废水管理；漏油预防和应急规划；文化财产保护；自然资源保护。⁷¹ 瑞典武装部队还在挪威北部举行的名为“寒冷反应”的联合军事演习中与挪威武装部队和其他行为体合作。这种合作大幅度降低了受演习影响地区所受损害的代价。⁷²

41. 自 2006 年以来，瑞典国防研究局一直在努力使联合国维持和平特派团适应环境，并使更多人认识到将环境因素视作冲突原因和成功完成使命的因素的重要性。⁷³ 该机构为题“绿动和平行动——政策和实践”的报告提供了资料。⁷⁴

42. 除了各国提供的资料之外，特别报告员还获得国际组织直接提供的资料和国际组织有关的资料。

⁶⁶ 挪威武装部队，Håndbok. Miljøvern i Forsvaret，第 48 和 49 页。

⁶⁷ 同上，第 101 页。

⁶⁸ 《环境法》(Miljöbalken)(SFS 1998:808)，第 9 章，第 8 条。

⁶⁹ 瑞典国防部与特别报告员之间的电子通信。

⁷⁰ 《军事行动环境手册》，2008 年 3 月，可查阅：www.forsvarsmakten.se/Global/Myndighetswebbplatsen/4-Om-myndigheten/Vart-arbetsatt/Vart-miljoarbete/Guidebook_with_hyperlinks_and_cover.pdf。

⁷¹ 部队部署环境工具箱，芬兰、瑞典和美国国防环境专家三方合作制定，可查阅：<https://pfpcconsortium.org/system/files/EnvToolboxDeployForces.pdf>。

⁷² 多年来，由于对环境代价和破坏以及防止这些代价和破坏的可能办法的认识提高，估计代价从大约 1 000 万瑞典克朗降至 100 万至 200 万瑞典克朗，可查阅 www.forsvarsmakten.se/sv/aktuellt/2014/03/skydd-for-miljon。

⁷³ 瑞典的参与可追溯到国防研究局几十年前的前身。

⁷⁴ Annica Waleij 等人，“绿动和平行动-政策与实践”（斯德哥尔摩，国防研究局，2011 年）。国防研究局是维持和平行动部和外勤支助部的合作伙伴，可查阅 www.un.org/en/peacekeeping/issues/environment/bestpractice.shtml。

联合国维持和平特派团的环境政策

43. 在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中，环境因素也很重要。维持和平行动部和外勤支助部均明确认识到维持和平行动可能对当地环境造成的破坏。因此，这两个部正在积极合作，确保环境可持续性。这两个部联合制订了处理环境问题的总体政策。⁷⁵ 这两个部及其合作伙伴近期指出，在综合行动管理中，需要采取更加明确和更加系统的做法来进行环境评估、监测和评价。⁷⁶

44. 开展这些工作是为了配合秘书长的绿动联合国倡议。2012 年 5 月，环境署发布了题为《绿动蓝盔——环境、自然资源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报告。该报告除其他外明确了联合国特派团可在调查和防止所关切问题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比如，确保联合国稳定特派团的卫生条件足以避免污染当地水道，⁷⁷ 以及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防止砍伐森林和非法交易自然资源。⁷⁸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45. 北约的所有行动计划都包括环境因素，这些因素是规划的组成部分。这些因素建立在《北约军事原则和环境保护政策》的基础上。⁷⁹ 《军事原则和政策》指出，世界各地对环境保护的关切“日益重要”，并表示，“法律和法规对在有计划的活动中保护环境影响和减少高风险行为的重视不断加强。”⁸⁰ 关于执行问题，《原则》指出，战略指挥部负责与各国取得共识，将这些原则和政策纳入概念、指示和程序，鼓励北约各国和伙伴国家据此调整此类标准。⁸¹

46. 北约就这一主题和有关主题制作的其他参考资料和文件清单很长，说明北约对这些问题的考虑具有深度和广度。⁸² 例如，北约的部队地位协定和其他类似安排也载有环境保护规定。此外，北约还有很多涉及环境保护不同方面的标准化协议。⁸³

⁷⁵ 见联合国，“环境与可持续性”。可查阅 www.un.org/en/peacekeeping/issues/environment。

⁷⁶ 见联合国，“分享最佳做法”。可查阅 www.un.org/en/peacekeeping/issues/environment/bestpractice.shtml。

⁷⁷ David Jensen 和 Silja Halle 编，《绿动蓝盔——环境、自然资源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内罗毕，和家属，2012 年），第 8 和 33 页。可查阅：www.un.org/en/peacekeeping/publications/UNEP_greening_blue_helmets.pdf。

⁷⁸ 同上，第 37 页。

⁷⁹ 2011 年 10 月北约军事原则和环境保护政策(MC 0469/1)。

⁸⁰ 同上，第 1 段。

⁸¹ 同上，第 9 段。

⁸² 关于北约环境保护政策的更多资料见 www.nato.int/cps/en/natolive/topics_80802.htm。

⁸³ 北约法律事务办公室与特别报告员之间的电子通信。

结论和免责声明

47. 各国迄今获得的关于和平时期和国际和平行动期间的实践和政策的资料有限，显然不足以宣称存在具有普遍性的实践。也不可能确立习惯国际法的证据。不过，这说明各国和各国际组织在和平时期规划和开展军事行动时有顾及环境因素的意识 and 明确愿望。从这些法律和政策来源的日期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新事项，它反映出一种普遍认识，即环境方面的关切不容忽视。在事先未考虑环境因素的情况下就开展国际军事合作及维持和平行动，这是无法想象的。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实例来自不同地区。从北欧国家获取的详细资料就是一个实例，不过，类似资料也可从其他地区获得。

48. 特别报告员仍然深信，更多国家已经或正在朝着同一方向发展，因此请那些尚未就委员会的邀请作出答复的国家据此提供资料。也欢迎各国和各国际组织与特别报告员直接联系。

六. 本报告的宗旨

49. 这份初步报告初步概述本专题的第一阶段，即适用于潜在武装冲突的相关规则和原则(和平时期义务)。由于本报告的关注重点是第一阶段，它将不涉及武装冲突期间采取的措施或冲突后措施本身，即使实施这些措施的必要准备行动可能需要在武装冲突爆发前采取。

50. 本报告没有载列此专题的一般背景和理由。特别报告员认为这将是不必要的重复，并请读者参考委员会 2011 年报告中的研究提纲。⁸⁴ 这意味着本报告将不提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等其他机构的工作。同样，本报告也不讨论 1972 年《斯德哥尔摩宣言》和 1992 年《里约宣言》等重要文件。⁸⁵

51. 在拟订报告框架时，特别报告员考虑到以下内容：

- (a) 在委员会非正式磋商期间表达的看法；
- (b) 各国在大会第六委员会表达的看法；
- (c) 各国应委员会第六十五届会议工作报告第三章中的要求提交的书面资料；
- (d) 通过直接与各国和各国际组织沟通获得的资料。

52. 报告将审查与范围和方法有关的一些问题，以及使用的某些术语和将审议的一些来源，然后再着手讨论此专题与委员会以前处理的一些其他专题的关系，例如：

- (a) 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

⁸⁴ A/66/10，附件 E。

⁸⁵ 关于条约和政治宣言汇编，见同上，附录一。

(b) 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

(c) 共有的自然资源；

(d) 预防危险活动造成跨界损害以及危险活动所致跨界损害的损失分配。⁸⁶

53. 本报告还将提及委员会正在开展的可能与本专题特别相关的工作。目的不是要重述委员会的工作，而是要提醒注意委员会已经开展了哪些工作，以酌情确保工作一致性。

54. 此后，报告将展开第一阶段的内容，确定国际环境法规定的、可以指导为减少潜在武装冲突造成的负面环境影响而采取的预防措施的现有法律义务和原则。关于防范和预防的原则和规则尤为重要，将较深入地介绍。此外，本报告还将简要介绍人权等其他国际法领域产生的与本专题相关的现有法律义务。这将包括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55. 和平时期法完全适用于没有正在发生武装冲突的情况，因此，面临的挑战是确定那些与本专题相关的和平时期规则和原则。在工作的这个阶段，试图评价这些规则可以在多大程度上继续适用于(或影响)武装冲突局势和武装冲突后局势还为时过早。例如，尽管进行环境影响评估的防范原则和义务有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定的可比义务，但武装冲突法规定的这类规则远非与和平时期义务一样。尽管如此，可以说这类战争时期及和平时期义务的部分基本目的和宗旨相当相似。以后一份关于专题第二阶段的报告将对这类规则进行比较。

56. 特别报告员的目的是，将本报告限于最重要的原则、概念和义务，而不是设法确定哪些公约在武装冲突期间继续适用。因此，特别报告员没有努力列出每一项管制保护环境或人权的国际或双边协定。⁸⁷ 这些条约完全适用于和平时期，这是本报告的重点。

57. 值得回顾的是，从 1976 年起至今的时期与本议题特别相关。1976 年，《改变环境技术公约》获得通过。一年后，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获得通过。这两份法律文书很重要，因为它们是明确规定在武装冲突中保护环境的第一批法律文书。⁸⁸ 这些文书中关于环境保护的条款是其时代的产物，即它们反映当时出现的国际社会的利益和环境关切。⁸⁹

⁸⁶ 特别报告员在秘书处的协助下，确定了委员会先前审议的可能与本专题有关的问题。

⁸⁷ 相关条约和非条约实践概览载于本专题研究提纲，见 A/66/10，附件 E，附录一。

⁸⁸ 《第一附加议定书》有 174 个缔约国，《改变环境技术公约》有 76 个缔约国，见 www.icrc.org/applic/ihl/ihl.nsf/Treaty.xsp?documentId=2AC88FF62DB2CDD6C12563CD002D6EC1&action=openDocument。

⁸⁹ 详情见本专题研究提纲，见 A/66/10，附件 E。

七. 在委员会和联合国以往讨论的基础上对该专题范围、方法和结果的一些反思

58. 有关此专题的范围、方法和预期工作成果的问题已经在委员会第六十五届会议协商期间讨论了(2013 年)。⁹⁰ 特别报告员坚持她在该届会议上首次提出的提案,即应从时间角度,而不是从特定国际法制度,如环境法、武装冲突法和人权法的角度处理本专题。因此,她提议委员会着手分三个时间段审议专题:武装冲突之前、期间和之后(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所提议的办法是要使专题较容易管理以及较容易界定。这种办法将使委员会能够清楚地确定可能在武装冲突不同阶段出现的与该专题相关的具体法律问题。此外,这种办法可能有助于提出具体的结论或准则。

59. 特别报告员还认为,工作的主要重点应是第一阶段,即那些与潜在武装冲突相关的和平时义务,以及第三阶段——冲突后措施。在审议第二阶段时,宜将重点放在非国际武装冲突局势上。

60. 委员会成员虽然在第六十五届会议期间普遍欢迎按时间段处理此专题的办法,但对应给予每个阶段的相对分量表达了不同看法。若干成员强调,第二阶段(武装冲突期间适用的规则)是最重要的阶段。其他成员则认为,最重要的阶段或者是第一阶段、第三阶段,或者两者均很重要。委员会内部意见分歧,这与各国在第六委员会辩论期间的意见分歧相似。

61. 不过,正如特别报告员以前指出的,虽然按阶段构思本专题将有助于委员会的工作,但不同阶段之间不可能有严格的分界线。这种分界线将是人为的,不能准确反映相关法律规则如何运作。例如,武装冲突法包括武装冲突之前、期间和之后适用的规则。时间阶段办法使这一专题较容易管理。并协助划定其范围。随着工作的进展,与不同时间段有关的法律规则如何交融在一起也将明朗化。

62. 归根结底,不论每一阶段有什么相对分量,委员会这一专题工作的出发点应保持不变:委员会不打算,也不能修改武装冲突法。相反,有人提议委员会的工作应侧重于确定和澄清国际法规定的与在以下情况下保护环境有关的指导原则和(或)义务:(1) 为潜在武装冲突做准备;(2) 实施武装冲突;以及(3) 与环境损害有关的冲突后措施。

63. 在进一步讨论之前,或许可以列举特别报告员建议不纳入本专题范围的几个具体专题。特别报告员在努力拟订具体的指导原则或结论(或本专题的成果可能采取的任何最后形式)时,始终意识到,出于实际、程序性和实质性的原因,需要限制本专题的范围,因此有必要排除或谨慎处理某些议题。

⁹⁰ 见同上。这些讨论是在主席编写的一份非正式工作文件的基础上进行的。该文件应与 2011 年提交的本专题研究提纲一并阅读。

64. 首先，有人提议本专题工作不涉及开采自然资源等环境压力导致或助长武装冲突爆发的情况。特别报告员的立场是，关于武装冲突根源的讨论在本专题范围之外。然而，这并不是说，这些问题本身不是重要的议题。⁹¹

65. 此外，特别报告员不愿将保护文化遗产问题纳入本专题。保护文化财产受到特定国际公约，主要是通过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通过的公约的高度管制，而这些管制覆盖和平时期和武装冲突局势。⁹² 不过，应当指出的是，一个国家⁹³ 和一些委员会成员鼓励特别报告员将文化遗产纳入本专题。

66. 在委员会 2013 年的非正式磋商中，一些成员告诫说，不要涉及武器问题，而若干成员则认为应该涉及。第六委员会辩论期间也出现了类似情况。⁹⁴ 特别报告员保留她的看法，即处理具体武器的影响不应是本专题的重点。“武器”也不应作为一个单独问题处理。适用于武装冲突情况的武装冲突法在相同的法律基础上处理所有武器，即基本禁止使用造成过度伤害或不必要痛苦的武器、射弹、材料和作战方法。它还禁止使用不能区分平民和军事物体、其影响无法限制的武器。对哪些特定武器属于这一禁令范围的问题一直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各国已选择就达姆弹、化学武器、地雷和激光致盲武器等具体武器签订特定条约。此外，各国缔结这类协定的理由也不尽相同。例如，关于如何看待协定和具体条款的看法可能不同：将其视作一项裁军措施，一项武装冲突法措施，还是两者都是？这一灵活的谅解已证明对实现最终目标，即禁止或限制使用特定武器非常宝贵。

67. 最后，特别报告员的立场是，应当谨慎对待难民法问题，或更具体地说，应当谨慎对待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造成的环境后果。由于各种原因，人们可能沦为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有些原因可能与武装冲突毫无关系。一个人无论其难民身份申请如何，难民营都可能会为他或她提供住所。但与此同时，必须承认，数百万人因为武装冲突而背井离乡，可能成为难民或境内流离失所者。逃离者以及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造成的环境影响可能相当大，已经引起土地被毁的索偿要求。⁹⁵ 委员会一些成员和若干国家认为应当讨论这类问题，特别报告员

⁹¹ 关于此问题的最近讨论，见 Onita Da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ecurity and Armed Conflict.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3), 特别是第三章中关于预警、早期行动和预防环境安全威胁的讨论，第 66 页及其后。

⁹² 《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的公约》，1954 年 5 月 14 日，海牙，以及其《第一议定书》(1954 年)和《第二议定书》(1999 年)。在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委员会的任务之一是监督执行《1999 年议定书》。教科文组织有一个坚实结构，以协助在武装冲突时期、包括在紧急行动中保护文化遗产。关于教科文组织活动的信息，可查阅 www.unesco.org/new/en/culture/themes/armed-conflict-and-heritage/the-hague-convention。

⁹³ 意大利(A/C.6/68/SR.24, 第 4 段)。

⁹⁴ 见本报告第三节。

⁹⁵ 本专题研究大纲承认这一点，见 A/66/10, 附件 E, 第 10 段。

也同意，不能完全忽视这个问题。然而，鉴于此议题的复杂性以及给予战争受害者的法律保护，特别报告员认为，必须以谨慎的方式处理这类问题。

八. 术语的使用

68. 此阶段需要注意的一个初步事项是“武装冲突”和“环境”等关键术语的定义。为便于讨论，下文提供了建议的定义草案。在工作的这一阶段，提出这些建议定义草案的目的不是要争取委员会准许把这些定义送交起草委员会。这样做还为时过早。通常的做法是，在工作发展到一个较成熟阶段从而有可能对工作方向有一个较明智认识后，再完善并确定定义。与此同时，必须倾听委员会关于本报告中所提建议定义草案的初步看法。此外，似乎还必须说明在界定这些术语时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这些建议定义所依据的是委员会先前确定的一些定义。不用说，那些定义是在其特定背景中并为了列入那些定义的工作的目的而确定的。然而，那些定义是有帮助的，尤其是考虑到委员会为制订它们作出了相当大的努力。

“武装冲突”

69. 委员会已在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条款⁹⁶ 中将“武装冲突”定义如下：

“武装冲突”是指国家间诉诸武力或政府当局与有组织武装团体之间长时间诉诸武力情形。”

70. 该定义是为该条款的目的而制订的。评注明确指出，它反映了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在“塔迪茨案”裁判中使用的定义。⁹⁷ 不过，前南问题国际法庭所提供“定义”的结论文字被省略了。在“塔迪茨案”裁判中，该法庭把武装冲突的存在描述如下：

“……国家间一旦诉诸武力或政府当局与有组织的武装集团或一国内部的此种集团之间一旦发生持久的武装暴力行动，武装冲突即告发生”（强调为后加）。

71. 委员会在关于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的工作中决定删除该定义[英文版]结尾的用词（“或一国内部的此种集团之间”），因为该条款草案设想仅适用于至少有一个条约缔约国卷入的情形。⁹⁸ 该定义经过深入分析和长时间讨论后获得通过。但是，它偏离了对其他条约中所含术语“武装冲突”的诠释。⁹⁹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国际刑院除其他外对严重违反非国际性质武装冲突中适用法律和

⁹⁶ A/66/10，第 100 段，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条款草案第 2(b)条。

⁹⁷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案件编号 IT-94-1-A72，检察官诉 Duško Tadić a/k/a“DULE”，上诉庭，对辩方关于管辖权问题提出中间上诉的请求所做出的裁决，1995 年 10 月 2 日，第 70 段。

⁹⁸ A/66/10，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条款草案第 1 条评注第 4 段，第 180 页。

⁹⁹ 例如见《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75 卷，第 970 至 973 号）共同第 2 条和共同第 3 条以及 1977 年 6 月 8 日《1949 年 8 月 12 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受害者的附加议定书》（同上，第 1125 卷，第 17513 号）第 1 条。

惯例的行为拥有管辖权。因此,《罗马规约》第八条第二(6)款适用于“在一国境内发生的武装冲突,如果政府当局与有组织武装集团之间,或这种集团相互之间长期进行武装冲突”。它不包括“内部动乱和紧张局势,如暴动、孤立和零星的暴力行为或其他性质相同的行为”。¹⁰⁰ 因此,《罗马规约》对这个术语的使用与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在“塔迪茨案”中的用法几乎相同。不过,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定义却有别于红十字委员会的一项提议¹⁰¹ 和国际法学会提出的定义。¹⁰²

72. 对“武装冲突”这一术语用法的这一简短介绍表明,使用关于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的条款中的定义可能不够。为本专题的目的,这个定义需要修改,以包括发生在有组织武装团体之间或“一国内部的这种团体之间”的那些冲突。这种修改将使定义符合或接近现载于《罗马规约》中的“塔迪茨案”中使用的定义。

73. 这就给委员会留下了下列有关选项:

- (a) 采用关于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的条款草案第 2 条中的定义,然后对其进行修改,以包括没有国家卷入的武装冲突情形;
- (b) 规定两个单独定义,一个用于国际武装冲突,一个用于非国际武装冲突;
- (c) 为本专题工作的目的,规定新定义;
- (d) 完全不对“武装冲突”进行界定。

74. 特别报告员建议委员会从关于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的条款草案第 2 条中所载定义出发,把没有国家参与的武装冲突情形包含在内。这将确保涵盖非国际武装冲突。应当指出,关于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的条款草案与目前的工作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正因为如此,任何偏离这些条款草案的举动都应当有正当理由并应提出解释。

75. 第二个选项是规定两个定义,一个用于国际武装冲突,一个用于非国际武装冲突。红十字委员会提出的非国际武装冲突的定义比出自“塔迪茨案”的“定义”更精确。这主要是由于红十字委员会的定义中嵌入了门槛。为本专题的目的,把两类情形都包含在一个定义内应该就够了。

¹⁰⁰ 1998 年 7 月 17 日《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187 卷,第 38544 号),第八条,第二(6)款。

¹⁰¹ 红十字委员会提出了以下定义:

“1. 一旦两个或更多国家之间诉诸武力,国际武装冲突即告存在。

2. 非国际武装冲突是出现在政府武装部队与一个或多个武装团体部队之间或发生在一个国家[《日内瓦四公约》缔约方]境内这种团体之间的长时间武装对抗。这种武装对抗须达到“最低限度烈度且卷入冲突各方须表现出最低限度组织程度”。载于红十字委员会“国际人道主义法中如何界定‘武装冲突’”一语”,见解性论文,2008 年 3 月,可查阅 www.icrc.org/eng/assets/files/other/opinion-paper-armed-conflict.pdf。

¹⁰² 国际法学会 1985 年赫尔辛基会议于 1985 年 8 月 28 日通过的关于“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的 1985 年决议。可查阅 www.idi-iiil.org/idiE/resolutionsE/1985_hel_03_en.pdf。

76. 第三个选项是为本专题工作的目的，规定一个全新定义，这个选项对特别报告员的吸引力较小。在先前谈判达成定义的基础上再接再厉并设法根据已通过的调整委员会的工作，意义要大得多。再添加另一种定义将有造成混乱的风险。

77. 最后一个选项是完全不对“武装冲突”进行界定，这是另一种可能性。这一专题的成果将取决于已提供的先前定义以及出自新条约和判例法的任何进一步完善。

78. 经考虑上述情况，建议使用该术语如下：

“武装冲突”是指国家间诉诸武力或政府当局与有组织武装团体之间或一国内部的这种团体之间长时间诉诸武力情形。

“环境”

79. 委员会先前已在危险活动所致跨界损害的损失分配原则中把“环境”定义如下：¹⁰³

“环境”包括非生物性和生物性自然资源，例如空气、水、土壤、动植物和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景观的特征。¹⁰⁴

80. 委员会注意到目前没有一个国际公认的环境定义，但认为采用一个“工作定义”是有益的。¹⁰⁵ 为此，委员会选择了一个较广泛的定义。这意味着该定义不局限于空气、土壤、水、动植物等自然资源及其相互作用。委员会通过的较广泛定义还包括环境价值。委员会选择列入了“景观的美学方面等非服务价值”。¹⁰⁶ 这包括享受大自然的风景名胜和休闲特征以及与这种享受相关的机会。这种较广泛的办法因原则草案的一般及剩余性质而被认为是合理的。¹⁰⁷

81. 值得注意的是，委员会在拟订上述定义时提到了 1972 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第 2 条。为该《公约》的目的，“自然遗产”被定义为：

“从审美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由物质和生物结构或这类结构群组成的自然面貌；

从科学或保护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地质和自然地理结构以及明确划为受威胁的动物和植物生境区；

¹⁰³ A/66/10，第 66 段。

¹⁰⁴ 同上，原则 2(b)草案，第 107 页。

¹⁰⁵ 《2006 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19 段，第 133 页。

¹⁰⁶ 在此可引述一些资料，作为关于生物多样性所受损害物理分析基础制度的基本原理，其中包括 Michael Bowman, “Biodiversity, intrinsic value and the definition and valuation of environmental harm”, 载于 Michael Bowman 和 Alan Boyle 编著 *Environmental Damage 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Comparative Law: Problems of Definition and Evalu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第 41 至 61 页。关于对环境损害进行定义的不同办法，例如见 Philippe Sands,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第 876 至 878 页。

¹⁰⁷ A/66/10，关于危险活动所致跨界损害的损失分配原则草案原则 2 评注第 20 段，第 133 页。

从科学、保护或自然美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天然名胜或明确划分的自然区域。”¹⁰⁸

82. 委员会采取全面做法也是受到了国际法院在“加布奇科沃-大毛罗斯”案中推理的启发：¹⁰⁹

“…认识到，在环境保护领域，鉴于环境损害往往具有不可逆转性质，并鉴于此类损害的赔偿机制本身内在的局限性，因此必须保持警惕和进行预防”。¹¹⁰

83. 委员会对环境的定义是经过精心分析和充分论证的，是可以理解的。因此，特别报告员提议将其用作本专题的一个出发点。与此同时，应当指出，在武装冲突法领域中，关于保护环境的最重要条款之一提到的是“自然环境”，而不单是“环境”。根据《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基本原则第35条第3款，“禁止使用旨在或可能对自然环境引起广泛、长期而严重损害的作战方法或手段”(强调为后加)。红十字委员会对该条的评注就限定词“自然”的使用提出了某种解释。“自然环境”有别于“人类环境”。“自然环境”指的是“生物机体及其无生命环境之间不可分割的相互关系统”，而对“人类环境”产生的效应则被理解为对“平民人口和生物机体的生命、发展和存活产生影响的外部条件和影响”的效应”。¹¹¹ 先前通过的《禁止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的公约》在提及环境时未作出任何界定。¹¹²

84. 与“武装冲突”定义的情况一样，委员会因而也面临着以下选项：

- (a) 使用危险活动所致跨界损害的损失分配原则草案中的定义；
- (b) 如果即将开展的工作有此要求，则改编危险活动所致跨界损害的损失分配原则草案中的定义；
- (c) 为本专题工作的目的，规定一个新定义；
- (d) 完全不对“环境”进行界定。

85. 值得注意的是，委员会并未在关于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条款中界定“环境”。虽说如此，这个术语却频繁使用。在关于跨界含水层法的条款中也是如此。

¹⁰⁸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世界遗产公约》)，1972年11月16日，巴黎(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037卷，第15511号)，第2条。

¹⁰⁹ 加布奇科沃-大毛罗斯项目(匈牙利/斯洛伐克)，判决书，《1997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7页。

¹¹⁰ 同上，第40段。“法院在这方面还提到需要注意代际和代内利益以及促进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当代需求”。

¹¹¹ 红十字委员会对第一附加议定书第35条的评注，第1451段。1980年10月10日日内瓦《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342卷，第22495号)序言提到了自然环境。

¹¹² 通过第35条时讨论过《禁止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的公约》中“环境”的较广泛含义，尤见红十字委员会对第一附加议定书第35条的评注，第1450-1452段。

在本专题的范畴内，一个定义很可能是在划定委员会所得结论的范围方面一件有价值的工具。

86. 特别报告员认为，危险活动所致跨界损害的损失分配原则中所含定义是一个有意义的出发点，因此建议将“环境”一语定义如下：

“环境”包括非生物性和生物性自然资源，例如空气、水、土壤、动植物和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景观的特征。

九. 需要参考的来源和其他材料

87. 关于这一专题的工作除其他外将肯定要借鉴条约法、国家及国际组织实践、习惯国际法、国际法通则、法院及法庭裁判和法律著述。在本专题的特定范畴内，应当简略叙述其中的每一个资料来源。

88. 关于条约法，只有数量有限的条约直接对武装冲突中的环境保护进行了规范。这些条约可能可以归类为武装冲突法(国际人道主义法、占领法和中立法)产生的条约。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有大量条约和国家立法对环境事项进行了规范。其中一些条约和立法文书都含有对军队、军事行动或军用物资免除管制的规定。这种免除管制规定可以是直接制订的，例如在《伦敦倾废公约》中。这项《公约》明确指出它不适用于“根据国际法享有主权豁免的船舶和航空器”，而同时也要求[旗帜]国“采取适当措施，确保其拥有或使用的这类船舶和航空器按照本公约的宗旨和目的行动”，并“向[国际海事]组织作出相应的报告”。¹¹³

89. 关于习惯国际法，应当指出，鉴于军事规划和军事行动的性质，识别与本专题相关的习惯规则可能特别困难。大量实践和内部法规并不能自动被解释为惯例的表现，因为其中很可能缺少法律确信这个要素。无论是国家自身还是其公布的文件，都强调说借鉴了手册、导则和最佳做法等软性法律文书，¹¹⁴ 但与这些文书平行存在的还有具约束力的国家立法和国际法律文书。不过，有时候，软性和硬性法律文书中反映的规范也会有交集，而且手册、导则和最佳做法以及其他类似文件对军事行动的规划和实施也具有真正的影响。这种影响的一个特别意义是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各国在这些事项上认识或立场的发展情况。最佳做法也可设立供法院或仲裁机构考虑的标准。

90. 特别报告员认为，国际性法院和法庭的判决和裁判与这个专题尤其相关。但确定国家法院的实践将要困难得多。鉴于无疑存在着涉及国内立法的丰富国家判例法，取得关于此类案件的进一步资料将是有益的。

¹¹³ 1972 年 12 月 29 日《防止倾废废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公约》(《伦敦公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046 卷,第 15749 号),第 7 条第 4 款。免除管制的条款属于另一种法律性质,不同于豁免权条款。

¹¹⁴ 例如见美国 2013 年 11 月 4 日在第六委员会就议程项目 81 作的发言(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三届和第六十五届会议工作报告),第 5 页。可查阅 <https://papersmart.unmeetings.org/media2/1141885/us-rev.pdf>。

91. 这项工作还将借重国际及区域组织在这方面的努力。若干联合国机构和国际组织参与了同武装冲突有关的环保工作，例如环境署、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以及红十字委员会。一些区域机构也是如此，其中包括非洲联盟、欧洲联盟、阿拉伯国家联盟和美洲国家组织。委员会成员支持并鼓励与这些机关、国际组织和区域机构磋商。¹¹⁵ 特别报告员认为，这种磋商有很大的帮助。因此，大多数这些磋商已经开展，并将随着工作的进展而继续进行。不言而喻，这些机构以及相关国际法律机构和专业组织所做工作¹¹⁶ 将是一项重要贡献。

92. 最后应当指出，这个专题提出的问题已经过博学学者们广泛的法律分析和论述。特别报告员面临着两个主要挑战。第一个挑战是限制学术著述的使用。第二个挑战是确保世界各大法律体系的观点都得到适当考虑。这是两个针锋相对的挑战。一个是要限制材料的范围，另一个是扩大对材料的搜寻。为应对这些挑战，特别报告员将有系统地找来自不同区域的法律分析和评注，而不是援引历来就此专题发表的所有材料。这意味着并非所有被研究过的文献都列入了本报告脚注。不过，特别报告员在本报告中附上了一份全面但并非详尽的参考书目。

93. 尽管特别报告员积极搜寻，但找到出自不同区域的著述构成了更大的挑战。特别报告员曾鼓励委员会的同事们和大会第六委员会的代表们向特别报告员提供信息，但除少数例外之外，特别报告员未能成功，因此，她将继续呼吁。

十. 与国际法委员会其他专题的关系，包括与本届会议议程上其他专题的关系¹¹⁷

94. 在其以往工作中，委员会处理了与当前专题有关的一些问题，其中包括：

- 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
- 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

¹¹⁵ A/68/10，第 142 段。

¹¹⁶ 国际法协会、国际法学会、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国际环境法理事会和环境法学会等其他机构的工作也得到了并将继续得到考虑。

¹¹⁷ 特别报告员选择将说明和意见限于委员会的以往工作，因为可以在委员会的正式文件找到。此外，还存在关于这些议题的若干宝贵的秘书处备忘录。例如，见关于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备忘录：实践与理论审查(A/CN.4/550)和 Corr.1 和 2)、有关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的备忘录(A/CN.4/39)、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相关国际文书汇编(A/CN.4/368)、秘书处编制的对“有关国家责任的国际法庭决定汇编”(A/CN.4/208)和秘书处关于“不可抗力”和“意外事件”作为排除不法性的情形：国家实践、国际司法裁决和学说调查的研究报告(A/CN.4/315)。

- 共有的自然资源(跨界含水层法);
- 国际法不成体系;
- 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
- 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
- 海洋法。

95. 此外, 预防危险活动的跨界损害问题(2001 年)和此类损害的损失分配问题(2006 年)这两个专题也在这方面具有相关性。

96. 在本报告中, 特别报告员要重申, 委员会以前通过的一些结论和评注与此直接有关。本报告将不述及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不成体系问题和国家责任问题等其他专题, 因为特别报告员希望在今后的报告中再次讨论这些专题。

《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1997 年)

97. 《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1997 年)明确规定在武装冲突期间保护国际水道和装置。特别是, 该公约第 29 条明确规定“国际水道和有关装置、设施和其他工程应享有适用于国际和国内武装冲突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给予的保护, 不得作违反这些原则和规则的使用”。

98. 委员会编写的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草案第 29 条的评注确认, 该条没有制定任何新的规则, 而是“提醒人们适用于国际和国内武装冲突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载有关于国际水道以及有关工程的重要规定”。¹¹⁸ 委员会很谨慎, 努力避免涉入现有武装冲突法范围,¹¹⁹ 但与此同时, 委员会申明“即使在武装冲突时期这些条款仍有效。在武装冲突期间, 水道国按照条款保护和使用国际水道以及有关工程的义务仍然有效。”¹²⁰

99. 正如评注所述, 武装冲突可能“影响国际水道以及水道国的保护和使用情况。”在这种情况下, 适用规范武装冲突的规则和原则。评注具体列明各项公约中体现的这些规则和原则的例子。这些例子包括: 1907 年关于陆战法规和习惯的《海牙公约》; 1949 年 8 月 12 日《日内瓦四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和马顿斯条款。¹²¹ 虽然这些公约不直接适用于非国际武装冲突, 委员会似乎表示, 尽管没有说明保护的义务, 该义务在非国际武装冲突中是适当的。

¹¹⁸ 见《1994 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 第二卷(第二部分)(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 E.96.V.2(Part 2)), 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第 29 条草案评注第 1 段。

¹¹⁹ 据认为, 制定关于该专题的详细管控规则超出了该文书的范围, 见同上。

¹²⁰ 同上, 第 29 条草案评注第 3 段。

¹²¹ 同上。

100. 委员会认识到，在武装冲突期间，各国在试图通过直接接触履行其合作义务时，可能面对严重的障碍。然而，这些困难不能消除各国进行合作的义务。¹²²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委员会插入了一项一般性例外条款，明确规定间接程序。¹²³这些程序是为了解决在武装冲突期间或在国家间没有外交关系时直接交流数据和资料和其他程序的问题。重要的是，例外条款规定，水道国没有义务提供对国防或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数据和资料，但其进行善意合作的义务仍适用。¹²⁴

101. 在发生与使用国际水道有关的冲突情况下，应特别考虑到“重要的人的需求所需资源”。¹²⁵委员会对这一规定的理解是，与马顿斯条款的规定相同。¹²⁶

跨界含水层法条款(2008年)¹²⁷

102. 跨界含水层法条款¹²⁸还在第18条中规定在武装冲突期间提供特别保护。特别重要的是，条款规定：

“跨界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及相关装置、设施和其他工程应享有适用于国际性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所给予的保护，并且不得以违反这些原则和规则的方式加以使用。”¹²⁹

103. 第18条是按1997年《国际水道公约》第29条编写的。这两项条款的案文几乎一样。¹³⁰此外，第18条评注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水道公约》第29条评注中的措辞。在这两条评注中提到的适用法律相同，如1907年《陆战法规和惯例海牙公约》、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的附加议定书和马顿斯条款。¹³¹此外，2008年条款草案的评注中明确指出，含水层国家保护和利用跨界含水层和相关工程的义务“即使在武装冲突时期也应有效”。¹³²这提醒各国武装冲突法的适用性。

¹²² 同上，第9条草案评注第3段。注意合作义务超出第9条的范围。

¹²³ 同上，第9条草案的评注。类似的例外条款出现在《在环境问题上获得信息、公众参与决策和诉诸法律的公约》等其他条约中(《奥胡斯公约》)，丹麦奥胡斯，1998年6月25日(联合国，《条约汇编》，第2161卷，第37770号)，第4(4)(b)条。

¹²⁴ 《1994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第31条草案，第132页。

¹²⁵ 同上，第10条第2款草案。

¹²⁶ 同上，第29条草案评注第3段。

¹²⁷ A/63/10，第四章，E节。

¹²⁸ 同上。

¹²⁹ 同上。

¹³⁰ 唯一的区别是使用“非国际武装冲突”这一术语，而不是“国内武装冲突”。

¹³¹ A/63/10，跨界含水层法第18条草案评注第3段。

¹³² 同上。

104. 与 1997 年《水道公约》类似，跨界含水层法条款规定了例外情况，即国家没有义务提供对其国防或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数据和信息。与此同时，它规定各国负有义务“同其他国家善意合作，视情况尽可能提供资料。”¹³³

105. 重要的是，《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和跨界含水层法条款在国际和非国际武装冲突情况下都适用。尽管武装冲突法适用，国家仍然有合作的义务。这两项公约清楚地规定，人类的需要优先于其他用途。

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条款(2011 年)¹³⁴

106. 这一条款的出发点是一个假设，即：一如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条款(第 3 条)规定，武装冲突的存在并不当然终止或中止条约的施行。但是，在这些条款中，委员会选择不明确指出将继续施行的具体条约，而是阐述了一个条约指示性清单，条约的“主题事项含有这些条约在武装冲突期间继续全部或部分施行之意”，并将这一条约清单列入条款草案的附件中(第 7 条)。

107. 然而，委员会述及条约是否可能被终止、退出或中止的因素(第 6 条)。委员会认为，应考虑所有有关因素，包括：

(a) 条约的性质，特别是其主题事项、目标和宗旨、内容和条约缔约方的数目；

(b) 武装冲突的特征，例如其地域范围、规模和严重程度、持续时间以及非国际武装冲突的外部介入程度。

108. 条款第 3、第 6 和第 7 条和载有各条约指示性清单的附件的综合结果是，由于一些与保护环境有关类别条约的主题事项，这些条约可能继续在武装冲突期间施行。¹³⁵

109. 可在第 3 条中发现的最重要结论如下：

“在下列缔约国之间，条约的施行不因武装冲突的存在而当然终止或中止：

(a) 武装冲突当事国之间；

(b) 武装冲突当事国与非当事国之间。”

¹³³ 同上，第 19 条草案。委员会讨论是否应使用“重要”一词为“保密性”定性，但“决定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偏离 1997 年《水道公约》的措辞”，同上，第 19 条草案评注第 1 段。

¹³⁴ A/66/10，第六章。

¹³⁵ 同上，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第 7 条草案(因其主题事项而使条约继续施行)及列入附件的条约指示性清单。该清单包括与下述事项相关的条约：国际环境保护、国际水道和有关装置和设施、含水层和有关装置和设施、人权和国际刑事司法，以及，因显而易见的原因，与武装冲突有关的条约，包括有关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条约。

110. 这一结论有两个意义：第一是，条约在武装冲突期间不会自动终止或中止。也就是说，那些参与冲突的国家并不自动失去各项条约赋予的这些权利和义务。第二点是，一项条约可能被终止或中止。

111. 尽管有关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的工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确实有其局限性。第一，它只规范国家之间的条约关系。第二，它没有回答在武装冲突期间哪些习惯国际法规则以及国际法原则继续适用的问题。此外，除了一个例外情况，条款涉及的是武装冲突期间的局势。¹³⁶

预防危险活动的跨界损害条款(2001 年)¹³⁷

112. 预防危险活动的跨界损害条款¹³⁸ (2001 年)没有讨论其在武装冲突期间的适用问题。根据关于范围的条款，条款适用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其有形后果有造成重大越境损害之危险的活动”。条款或其评注都没有明确排除武装冲突局势。不过，评注中载有一项有关预防问题的第 3 条中规定的尽责原则的重要讨论。¹³⁹ 这一讨论提到 Alabama 案件。¹⁴⁰ 尽管如此，仍然不可能作出这些条款的宗旨是规范各国在武装冲突中行为的结论。其侧重点似乎是和平时期的监管。

关于危险活动所致跨界损害的损失分配原则(2006 年)¹⁴¹

113. 2006 年关于危险活动所致跨界损害的损失分配原则将“损害”定义为包括对人身，财产或环境造成的重大损害。这包括环境损害造成的损失或损害；为恢复财产或环境、包括为恢复自然资源而采取的合理措施的费用；合理应对措施的费用。¹⁴² 重要的是，第 4 条原则的评注给出了一个例外情况：如果损害是武装冲突、敌对行动、内战或叛乱所致，则不适用迅速和充足赔偿责任。¹⁴³

委员会的其他工作

114. 委员会其他以往相关工作，如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的条款，以及关于海洋法的条款，将在与其有关的背景中涉及。

¹³⁶ 同上，第 13 条草案，该条涉及武装冲突结束后使条约关系再次生效或恢复条约关系的问题。

¹³⁷ 《2001 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04.V.17(Part 2))，第五章，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的条款草案(预防危险活动的跨界损害条款)。

¹³⁸ 同上。

¹³⁹ 同上，第 3 条评注第 9 段，第 154 页。

¹⁴⁰ 同上。尽责的法律规范在和平时期和武装冲突局势中都适用。

¹⁴¹ A/61/10，关于危险活动所致跨界损害的损失分配原则第五章，E 节。

¹⁴² 同上，原则 2(a)(3)至(5)。另见，同上，有关在战争时期保护文化财产的原则 2 评注第 10 段，第 127 页。

¹⁴³ 同上，原则 4 评注第 27 段，第 161 页。特别是，见第 434 条脚注所举的例子。

115. 此外，委员会将从目前正在开展的关于在发生灾害时保护人员的工作及其结论中受益。关于人类尊严、人权、人道主义原则和合作义务(包括合作形式)等事项条款的工作将特别具有意义。¹⁴⁴

116. 委员会还可从正在开展的保护大气层工作中受益，因为这两个专题都涉及保护环境。不过，两个专题不太可能重叠，因为与本专题相比，保护大气层专题更为全面并且性质不同。委员会当前工作方案中的其他专题，特别是有关条约解释和确定习惯国际法的嗣后协定和嗣后惯例的专题也有助于这一专题的工作。

十一. 环境原则和概念

117. 首先应指出，本节的目的是回顾国际法中可能在武装冲突期间继续适用的原则和概念，不会涉及它们可能适用的程度。在目前的初期阶段，这份报告无意得出任何最终结论。相反，报告旨在协助促进委员会即将进行的讨论。

118. 引用环境法原则或人权原则是出于方便的目的。这些引用并不意味着断言它们是自成体系的制度。委员会关于不成体系问题的研究曾系统阐述如下：

“‘国际环境法’是否应划分为国际法的一个特别部门且适用比较狭义的释法原则，还是仅仅作为环境条约或习惯规则的总汇，这个问题或许显得过于抽象，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例如，标准做法是认定武装冲突法律为特别法和自成体系的制度，或甚至将其看作是‘一套偏离国际公法的规则’，但这样一来，条约法等法律制度一般规则的适用程度则非常不确定。”¹⁴⁵

119. 在和平时期，即武装冲突之前和之后，条约当然可不受限制地适用，因为缔约国同意接受其约束。此外，习惯国际法也同样适用。从这一角度来看，连谈论冲突前和冲突后阶段似乎都是多余的。¹⁴⁶ 然而，情况并非如此。谈论冲突前和冲突后阶段恰恰是因为有关它们与武装冲突法律平行适用的问题存在不确定性。已在多处已经指出，关于武装冲突法律的条约的某些规定适用于和平时期。

120. 由于明显的原因，难以列出所有现存的“环境”和“人权”条约并讨论它们在和平时期的适用性。试图全面描绘这些文书、这些条约的缔约国及其保留等等之间的相互作用则是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这一工作将毫无意义，因为它试图击中一个移动的目标。此外，这样做只能呈现法律情况的一部分，因为习惯法和判例法都将被排除在外。

¹⁴⁴ 见 A/66/10，第 288 段，第 5 至 10 条。

¹⁴⁵ 国际法委员会研究组的报告，《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国际法多样化和扩展引起的困难》(A/CN.4/L.682)，第 133 段。

¹⁴⁶ 在大会辩论中，俄罗斯联邦表示，“关于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专题，国际人道主义法已有足够的规定，因为武装冲突之前和之后的时期被视为和平时期，在此期间，适用于环境保护的一般规则完全适用”。见 A/C.6/68/SR.25，第 47 段。

121. 在这一阶段的工作中，更具建设性的做法可能是尝试追踪许多已被写入条约或者已经获得或可能获得习惯国际法地位的原则和概念的总体发展。

122. 必须指出，与本专题相关的环境法原则和概念是不准确和模糊的，并且很少提供确切的答案和解决办法，但它们的确存在。本节的目的是回顾自《改变环境技术公约》(1976年)和《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1977年)通过以来最显著的发展路线。

123. 像可持续发展或风险预防这样的政治概念是否已成为一项法律原则，这往往有待各个国家和学者们辩论。各法院和法庭对某一概念的地位持有不同意见的情况并不少见。意见的分歧并不妨碍它们应用其对法律的理解。风险预防原则是这方面的一个良好例子。因此，特别报告员在本报告中既提及“原则”也提及“概念”。

124. 如上文所述，特别报告员认为，各国际法院和法庭的判决和裁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国内法院的做法则较难确定。显然，在国内立法方面肯定存在丰富的国家判例法，但这并不一定有助于确定它们是否反映出某一国家关于国际法的立场。各国并未提供这方面的资料。因此，本报告援引的是国际判决。

1. 可持续发展

125. 可持续发展是保护环境及其资源与人类需求之间的必要联系。它有一个明显的代际因素。无论使用什么资源，其使用方式都应确保这些资源能够持续不止一段有限的时间，即不止一个世代。

126. 人们常常强调，“可持续发展”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个政治和社会经济的概念而不是法律原则。¹⁴⁷ 因此，这一概念的法律地位有待辩论。提及“可持续发展原则”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一专有名词的使用者在特指一项法律原则——这种提法很可能具有政治内涵。总之，关于这一概念是否具有法律含义存在不同的看法，其他人持更加怀疑的态度。

127. 国际法院在加布奇科沃-大毛罗斯项目案(1997年)中涉及到这一点：

“从古至今，人类出于经济和其他原因，不断干涉自然。在过去，这种干涉往往是在没有考虑对环境影响的情况下实施的。由于出现新的科学见解，以及人们日益认识到以一种不加考虑、毫不减弱的速度实施这种干预给人类今世后代带来的风险，过去二十年间已经制订了新的规范和标准，载于大量文书中。各国在考虑开展新的活动时，以及在继续开展始于过去的活动时，都

¹⁴⁷ Duncan Frenc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载于 Research Handbook O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Malgosia Fitzmaurice, David M. Ong 和 Panos Merkouris 编辑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0), 第 51 页。

必须考虑到这些新规范，并给予这些新标准适当的重视。这种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需要可在可持续发展概念中得到了恰当的体现。”¹⁴⁸

128. 国际法院没有就可持续发展的法律地位问题采取立场，但副院长威拉曼特里在其个别意见中采取了明确的立场，认为可持续发展是一项法律原则以及“国际法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¹⁴⁹

129. 十多年后，国际法院在纸浆厂案¹⁵⁰中涉及到可持续发展概念，提到“公平合理利用共有资源与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平衡即可可持续发展的本质之间的相互联系”。虽然国际法院并未提到可持续发展是一项一般国际法原则，但哈苏奈法官和西马法官在其联合反对意见中提到了可持续发展原则。¹⁵¹此外，坎卡多·特林达德法官将其个别意见的全部篇幅用于国际法原则，其中专门讨论了可持续发展作为一项国际法原则的问题。¹⁵²

130. 正如科罗马(前)法官的系统阐述，“可持续发展逐渐在国际法院的判例中发挥重大作用，尽管法院尚不认为它属于《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1)所指的一般法律原则”。¹⁵³“科罗马法官继续指出：“总体而言，关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国际法在过去三十年中已迅速演变、融合，达到几乎所有国家都广泛接受的地步。国际法院现在在裁定国家间争端时会提及可持续发展，而且还通过其判例推动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这一概念。展望未来，显然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将在制定国际规范、条约和司法判决方面继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¹⁵⁴

¹⁴⁸ 加布奇科沃—大毛罗斯项目案(匈牙利诉斯洛伐克)，判决，《1997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7页，第140段。

¹⁴⁹ 同上，威拉曼特里副院长的个别意见，第88至116页，例如，在第89、95和110页，可见其非常明确的见解。其他法官则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这一概念。小田法官在其反对意见中将经济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视为“相互冲突的利益”，第153至169页中的第160和161页。

¹⁵⁰ 乌拉圭河沿岸的纸浆厂案(阿根廷诉乌拉圭)，判决，《2010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14页，第177段。

¹⁵¹ 同上，哈苏奈法官和西马法官的联合反对意见，第26段。

¹⁵² 同上，坎卡多·特林达德法官的个别意见，例如，见第139段和脚注118，其中提到 Philippe Sands,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第2版(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第252、260和266页；Christina Voig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 a Principle of International Law*, (Leide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9), 第145、147、162、171和186页。由于各国不能将科学不确定性作为不采取行动的理由，在面对可能对环境造成严重损害的风险时，预防原则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一样，应发挥作用；Patricia Birnie, Alan Boyle and Catherine Redgwell,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Environment*, 第3版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第163页。

¹⁵³ Abdul G. Koroma, “Law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jurisprud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刊登在 *International Law and Changing Perceptions of Security* (Brill, 即将发表)。

¹⁵⁴ 同上。科罗马法官指出，核武器案(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咨询意见，《1996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226页)和武装活动案(刚果境内的武装活动(刚果民主共和国诉乌干达)，判决，《2005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168页)是国际法院间接涉及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两个案例。

131. 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也就可持续发展概念作出了评论。例如,在欧洲共同体给予发展中国家关税优惠条件案中,上诉机构指出,这一概念是成员国按照《世贸组织协定》序言部分可以寻求实现的目标之一。¹⁵⁵ 在虾龟案中,上诉机构指出,序言部分使用的措词“表明世贸组织谈判人员确认应当按照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以最佳方式利用世界资源”。¹⁵⁶ 在虾龟案中,法庭还指出,有关国家应设法找到与受影响国家合作解决问题的方案。¹⁵⁷

132. 常设仲裁法院在莱茵铁路公司案仲裁中涉及到可持续发展问题。常设仲裁法院在该案中指出,“新出现的原则,不论其目前地位如何,都提到养护、管理、预防和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以及为子孙后代采取保护行动。”¹⁵⁸

2. 损害预防和风险预防

133. 损害预防原则是国际环境法依据的基本原则,其根源可追溯至特雷耳炼锌厂案。¹⁵⁹ 该原则与风险预防原则紧密相连。

134. 损害预防的原则被确认为习惯国际法,主要适用于跨界问题。它被列入国际条约,并在判例法中得到确认(包括上文提到的纸浆厂案和加布奇科沃一大毛罗斯项目案)。例如,欧洲联盟已经将风险预防原则连同损害预防原则编入了《欧洲联盟运作条约》第 191(2)条。¹⁶⁰ 虽然损害预防原则是一项独立原则,但如果没有具体条约中更确切的条例支持,该原则并不能真正有效地发挥作用。从本质上讲,除非由该原则产生的义务得到明确规定,否则不可能有任何赔偿责任。《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公约》就是这方面一个很好的例子。该《公约》的宗旨是预防和消除海洋环境污染。出发点是各缔约方有义务实施“风险预防原则”和“谁污染谁付费”原则。¹⁶¹ 此外,《公约》更详细地规定了义务,以实现《公约》的目标和宗旨。

135. 在莱茵铁路公司案(见上文)中,法庭认为“损害预防义务正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¹⁶² 继而指出:

¹⁵⁵ 欧洲共同体给予发展中国家关税优惠条件案, WT/DS 246/AB/R, 2004 年 4 月 20 日通过, 第 94 段。

¹⁵⁶ 美国——禁止进口特定虾类与虾产品案, 小组报告 WT/DS58/R.1 和 Corr.1, 1998 年 11 月 6 日通过, 经上诉机构报告 WT/DS58/AB/R 修正, 第 153 段。

¹⁵⁷ 同上, 第 168 段。

¹⁵⁸ 莱茵(“Ijzeren Rijn”)铁路公司案(比利时诉荷兰)仲裁裁决, 2005 年 5 月 24 日《国际仲裁裁决汇编》, 第二十七卷, 第 35 至 125 页, 第 58 段。

¹⁵⁹ 特雷耳炼锌厂案(美国, 加拿大), 1938 年 4 月 16 日及 1941 年 3 月 11 日,《国际仲裁裁决汇编》, 第三卷(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 1949.V.2), 第 1905 至 1982 页。

¹⁶⁰ 正如 Nicolas de Sadeleer 所指出的, 大多数学者认为欧盟运作条约第 191(2)条具有约束力。N. de Sadeleer, *EU Environmental Law and the Internal Marke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脚注 180, 其中提及 Winter、Epiney、Hilson、Krämer、Fisher 和 Doherty。

¹⁶¹ 《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公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354 卷,第 42279 号),第 2 条。

¹⁶² 莱茵(“Ijzeren Rijn”)铁路公司案(比利时诉荷兰)仲裁裁决, 2005 年 5 月 24 日, 第 222 段。

“环境法和发展法并不是相互替代而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概念，要求在发展可能对环境造成重大损害的情况下，有义务预防或至少减轻这种损害。……法庭认为，这一义务现已成为一项一般国际法原则。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自主活动，而且也适用于为执行缔约国之间的具体条约而开展的活动。”¹⁶³

136. 欧洲法院在联合王国诉欧洲共同体委员会案中也涉及了损害预防原则，法院在该案件中指出，“(《欧洲共同体条约》)第 130r(2)条规定，该政策旨在提供较高程度的保护，尤其将根据以下原则：应当采取损害预防行动，并确保在欧共体其他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纳入环境保护要求。”¹⁶⁴

137. 损害预防原则侧重于已经获知或者有能力获知的损害，而风险预防原则要求即使在尚未科学确定损害的情况下采取行动。¹⁶⁵ 风险预防原则的目的是消除尚未经过充分科学研究和分析探索的潜在风险。如果某一特定活动的环境影响是已知的，那么为避免这些影响所采取的措施只是损害预防措施；如果这些影响是未知的，同样的措施将被称为风险预防措施。若干文书将它们作为两个不同的原则提及，但在实践中情况并非如此简单，这是因为在适用这两个原则时，很难明确区分这两个概念。¹⁶⁶ 有些文书在提到风险预防原则时，指的是一种损害预防和风险预防方法。关于采取风险预防措施的义务是否意味着该义务已经被提升为一项原则，目前尚未达成普遍共识。10 多年前，菲利普·桑兹指出，“有些国际法院现已愿意适用风险预防原则，其他法院已愿意悄悄这样做”。¹⁶⁷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法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不一。在涉及跨界含水层法的工作中，委员会使用了“风险预防方法”。然而，评注明确指出，委员会“深知关于‘风险预防方法’的概念，存在着不同见解”，委员会没有使用“风险预防原则”。尽管如此，委员会之所以决定采用“风险预防方法”一词，是因为它是争议最小的提法。采取这样的提法是基于这样的谅解：“本着诚意适用时，这两个概念在实践中将产生相似的结果”。¹⁶⁸ 这与委员会此前在关于预防危险活动所致跨界损

¹⁶³ 同上，第 59 段。

¹⁶⁴ 联合王国诉欧洲共同体委员会(C-180/96)(1998)ECR I-2265, 第 99 和 100 段。另见 R.v.Ministry of Agriculture,Fisheries and Food,Commissioners of Customs and Excise(C-157/96)(1998) ECRI-2211, 第 64 段。

¹⁶⁵ Arie Trouwborst, Evolution and status of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in international law,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and Policy Series,第 62 卷(The Hague,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2), 例如, 见第 36 和 37 页。

¹⁶⁶ 在环境法方面，损害预防和风险预防可能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正如下一份报告将指出的，做决定的基础是“知道”还是“不知道而且不能预见”，这个区别可能意味着是某项行动是违反武装冲突法的行动还是法律上可接受的行动。

¹⁶⁷ S. Philippe,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第 290 页。

¹⁶⁸ A/63/10,跨界含水层法条款草案，第 12 条评注，第 5 段。

害的条款草案的工作中所持的意见形成鲜明对照。在前述工作中，委员会似乎毫不犹豫地提到了风险防范原则。¹⁶⁹

138. 在国际海洋法法庭审理的混合氧化物燃料厂案中，沃尔夫鲁姆法官在其个别意见中表示，“国际环境法中的风险防范原则或风险防范办法是否已成为习惯国际法的一部分的问题仍在讨论”，“这一在国际环境法中适用的原则或方法反映出有必要在关于某一特定活动未来可能造成的损害存在科学不确定性时，作出与环境有关的决定。”¹⁷⁰

139. 风险防范原则旨在预防那些不可预见或在科学上不确定的风险，其适用情况取决于背景因素，因此可能变化不定。为满足风险防范原则的要求，可采取不同的手段，如禁止物质或技术，应用现有最佳技术，进行环境影响评估，实施环境质量标准，采取养护措施，或实行综合环境监管。¹⁷¹ 或者，用委员会的话来说：“(风险防范原则)意味着各国需要持续审查其预防义务，以便跟上科学知识的进步”。¹⁷²

140. 世贸组织在若干起案件中涉及到该原则。在欧共体荷尔蒙案中，欧洲共同体建议将风险防范原则视为“国际法的一般习惯规则或至少是一条一般法律原则”。¹⁷³ 上诉机构在裁决中指出，该原则“仍有待有权威的方面拟定”，¹⁷⁴ 但同时也指出，世贸组织《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第 5.7 条反映了该原则，并且“没有必要假定第 5.7 条详尽无遗地论述了风险防范原则的相关性”。¹⁷⁵ 在美国——继续中止减让/加拿大——继续中止减让案中，世贸组织上诉机构再次指出，《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第 5.7 条反映了风险防范原则。¹⁷⁶ 此外，上诉机构在日本——影响农产品措施案中指出，《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第 5.7 条为成员规定了义务，即成员“应设法获得更多的必要信息，以更客观地评估风

¹⁶⁹ 《2001 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关于预防危险活动所致跨界损害的条款草案，对第 10 条的评注，第 6 和第 7 段，第 162 和 163 页。

¹⁷⁰ 国际海洋法法庭，第 10 号案件，混合氧化物燃料厂案(爱尔兰诉联合王国)，临时措施，2001 年 12 月 3 日命令，沃尔夫鲁姆法官的个别意见。

¹⁷¹ Arie Trouwborst, *Evolution and status of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in International Law*, 例如，见第 52 页。

¹⁷² 《2001 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预防危险活动造成跨界损害条款草案，对第 10 条草案的评注，第 7 段，第 163 页。

¹⁷³ 欧洲共同体有关肉类及肉制品措施(荷尔蒙)案，WT/DS26/AB/R，WT/DS48/AB/R，1998 年 2 月 13 日通过，第 16 段。

¹⁷⁴ 同上，第 123 段。

¹⁷⁵ 同上，第 124 段。

¹⁷⁶ 美国/加拿大-在欧共体荷尔蒙争端中继续中止减让义务案，WT/DS321/AB/R，2008 年 11 月 14 日通过，第 680 段。

险”。¹⁷⁷ 在欧共体荷尔蒙案中，上诉机构指出，“负责和具有代表性的政府可以根据合格和受人尊重的来源提出的在特定时期可能有分歧的意见，本着诚意行事”。¹⁷⁸

141. 在欧共体生物技术产品案中，专家组提到了上诉机构在欧共体荷尔蒙案中作出的裁决，并提到“关于风险预防原则是否构成一般国际法或习惯国际法的一项公认原则的辩论仍在进行之中”。¹⁷⁹ 专家组表示，“由于风险预防原则的法律地位仍未解决，如此前的上诉机构一样，我们认为，出于谨慎我们不应试图解决这一复杂的问题，特别是在没有必要这样做的情况下”。¹⁸⁰

142. 在 *Balmer-Schafroth* 诉瑞士案中，欧洲人权法院七名法官的反对意见说明了该原则的法律重要性。¹⁸¹ 由于在核电站运营许可续期时，缺乏审查其运行状况安全性的手段，持反对意见的法官辩称，《欧洲人权公约》第 6 条(获得有效补救的权利)受到了侵犯。持反对意见的法官辩称，该条款受到侵犯的原因是，“申诉人甚至未被给予机会向法院证明危险的严重性以及由此将给他们带来多么巨大的风险”。¹⁸² 持反对意见的法官表示，“多数法官似乎忽略了国际机构和国际公法保护人员和财产的整体趋势，这种趋势在欧洲联盟和欧洲委员会有关环境的文书、里约协定、教科文组织文书、风险预防原则的发展以及保护共同财产的原则中显而易见”，他们“本来希望欧洲法院的判决能够通过加强‘风险预防原则’和充分司法补救，保护个人的权利免受当局不谨慎行为的影响，促进保护个人的国际法在这个领域取得进展。”¹⁸³

143. 同样，在国际海洋法法庭审理的新加坡在柔佛海峡内部和周围填海拓地案中，马来西亚将该原则形容为一个“按照国际法必须为任何一方适用和履行相关义务提供指导”的原则。¹⁸⁴ 欧洲法院也在一些案件中对风险预防问题给予重视，例如，在辉瑞动物保健公司诉欧洲联盟理事会(*Pfizer Animal Health SA v. Council*)案(T-13/99)中，法院指出，“按照风险预防原则，共同体机构有权为人类健康起见，根据到目前为止尚不完善的科学知识，采取可能会严重损害受到法律保护的立场

¹⁷⁷ 日本-影响农产品措施案，WT/DS76/AB/R，1999 年 3 月 19 日通过，第 92 段。

¹⁷⁸ 欧洲共同体有关肉类及肉制品措施(荷尔蒙)案，WT/DS26/AB/R，WT/DS48/AB/R，第 194 段。

¹⁷⁹ 欧洲共同体-影响生物技术产品的批准及销售措施案，WT/DS291/R/WT/DS292/R/WT/DS293/R/Add.1 至 Add.9 和 Corr.1，2006 年 11 月 21 日通过，第 7.88 段。

¹⁸⁰ 同上，第 7.89 段。

¹⁸¹ *Balmer-Schafroth v. Switzerland*, 26 August 1997, Judgement, Application No. 22110/93, ECHR Reports 1997-IV. Pettiti 法官联合 Gölcüklü、Walsh、Russo、Valticos、Lopes Rocha 和 Jambrek 法官的反对意见。

¹⁸² 同上。

¹⁸³ 同上。

¹⁸⁴ 国际海洋法法庭，第 12 号案件—关于新加坡在柔佛海峡内部和周围填海拓地案(马来西亚诉新加坡)，临时措施，2003 年 10 月 8 日的命令，第 74 段。

的保护措施，它们在这方面享有宽泛的酌处权”，在雅莱公司诉欧洲联盟理事会 (Al-pharma Inc. v.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T-70/99)案中，法院指出，“尽管当事方的共识是，共同体机构可以按照第 70/524 号指令，根据风险预防原则采取措施，但它们无论就该原则的解读还是就共同体机构在本案中是否正确应用了该原则都无法达成一致”。¹⁸⁵ 此外，在法国绿色和平组织等诉农业和渔业部等(Association Greenpeace France and Others v. Ministère de l’ Agriculture et de la Pêche and Others)案(C-6/99)中，法院指出，“遵守风险预防原则在第 90/220 号指令第 11(6)条规定的通知义务中得到体现。”¹⁸⁶

144. 正如瓦登海(Waddenzee)案所示，欧洲联盟成员国有义务遵守该原则，即使该原则并未在某一指令或条例中被具体提及。¹⁸⁷ 在瓦登海案中，荷兰一项关于在瓦登海鸟类特别保护区捕捞活动的环境影响评估条例被诉至法院。法院指出，对当前问题的解释应“特别依据风险预防原则，这是共同体环境政策寻求实现的高度保护的基础之一。”¹⁸⁸

145. 总体而言，由于这些原则的普遍性，欧洲联盟各机构在制定具体措施执行这些原则时，在所使用的手段方面获得了某种程度的酌处权。¹⁸⁹ 然而，当所涉及的原则在一个全面的授权制度中得到详细说明时，酌处权可能有限，甚至根本不存在。¹⁹⁰

146. 同样，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都认为，环境影响评估是遵守风险预防原则的方式之一。这体现在以下方面：(一) 关于评估某些计划和方案对环境影响的 2001

¹⁸⁵ Al-pharma Inc. v.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Case T-70/99(2002) ECR II 3495, 第 137 段。

¹⁸⁶ Association Greenpeace France and Others v. Ministère de l’ Agriculture et de la Pêche and Others Case C-6/99(2000) ECR I-1651, 第 44 段。

¹⁸⁷ Landelijke Vereniging tot Behoud van de Waddenzee and Nederlandse Vereniging tot Bescherming van Vogels v. Staatssecretaris van Landbouw, Natuurbeheer en Visserij (Waddenzee), Case C-127/02 (2004) ECR I-7405,第 44 段：“特别依据预防原则，按照《欧共体条约》第 174(2)条第一项，该原则是共同体环境政策寻求实现的高度保护的基础之一，对生境指令的解释必须参照该原则。”另见 de Sadeleer, EU Environmental Law and the Internal Market,第 44 页。

¹⁸⁸ Waddenzee,第 44 段。

¹⁸⁹ de Sadeleer, 第 42 页。

¹⁹⁰ Waddenzee, 第 44 段。Sweden v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Case T-229/04(2007) ECR II-2437,例如，见第 163 和 164 段：

“163. 然而，应当指出的是，从第 91/414 号指令第 4(1)(a)条可以看出，为了满足该指令第 4(1)(b)条的要求，必须适用附件六规定的统一原则。此外，第 97/57 号指令序言部分第二个叙文确定了附件六规定的内容，该叙文指出，该附件必须规定统一原则，以确保以统一的、符合第 91/414 号指令要求的尽可能严格的方式适用该指令第 4(1)(b)、(c)、(d)及(e)条的规定。

“164. 因此，第 91/414 号指令第 4(1)(b)条(该指令第 5(1)(b)条明确援引了这一条)要求遵守附件六规定的统一原则。”

年指令；¹⁹¹ (二) 关于保护自然生境和野生动植物的 1992 年指令；¹⁹² (三) 交换关于有害活动影响的数据的义务等其他措施。¹⁹³

147. 有趣的是，欧洲法院在 2011 年欧盟委员会诉西班牙案¹⁹⁴ 中强调了这样的事实，即风险预防方法相对于事后采取措施而言，更符合成本效益。这一论点也体现在关于这一专题的军事手册中(例如芬兰、瑞典和美国编制的联合军事指南)。

3. 谁污染谁付费

148. “谁污染谁付费”原则可以追溯到特雷耳炼锌厂和霍茹夫工厂案。¹⁹⁵ 其目的是补救。下述说法或许是准确的：“最初制定该原则是为了分配污染预防和控制措施的费用，但[该原则]已发展成为环境保护、人类健康和安全、资源管理和总体上确保各项活动对环境上具有可持续性的一项庞大战略。”¹⁹⁶ “谁污染谁付费”原则既适用于国家间关系，也适用于民事赔偿责任制度。

149. 1987 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争端解决小组审理的美国化学品税收案裁定，《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税收调整规则允许当事方适用这一原则，但不要要求必须适用该原则。该小组指出，虽然该条例“允许缔约国[……]采取“谁污染谁付费”原则，但并未强制各国一定这样做。¹⁹⁷ 欧洲法院也在 *Standley and Others* 案中注意到这一原则，欧洲法院指出，“‘谁污染谁付费’原则体现了相称原则”。¹⁹⁸

4. 环境影响评估

150. 环境影响评估是防止破坏环境工作的一部分。正如已经所指出的，环境影响评估是需要进行的一项程序。该评估不设置实质性的环境标准，也不说明要取

¹⁹¹ Directive 2001/42/EC on the assessment of the effects of certain plans and programmes on the environment, OJ L197, 2001 年 7 月 21 日。

¹⁹² Directive 92/43/EEC on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al habitats and of wild fauna and flora, OJ L 206, 1992 年 7 月 22 日。

¹⁹³ Directive 2001/42/EC on the assessment of the effects of certain plans and programmes on the environment, 第 7 条。

¹⁹⁴ *Commission v Spain*, Case C-400/08(2011) ECR I-915, 第 92 段。

¹⁹⁵ 霍茹夫工厂案，常设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系列 A，第 9 号，1927 年 7 月 26 日。

¹⁹⁶ Priscilla Schwartz, “The Polluter-Pays Principle” 载于 *Research Handbook o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Malgosia Fitzmaurice, David M. Ong 和 Panos Merkouris 编辑.(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0), p.257 页。

¹⁹⁷ *United States -Taxes on Petroleum and Certain Imported Substances*, 1987 年 6 月 17 日通过的小组报告 L/6175-34S/136), 第 5.2.5 段。

¹⁹⁸ *R.v.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Environment, Minister of Agriculture, Fisheries and Food, ex parte H.A.Standley and Others*, Case C-293/97(1999)ECR I-2603, 第 51 和 52 段。

得哪些成果。¹⁹⁹ 尽管如此，但国内法和国际法都要求进行环境影响评估。在这方面最突出的一项公约是 1991 年《越境环境影响评估公约》(所谓的“埃斯波公约”)。

151. 在马菲基尼案中，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确认，环境影响评估是“适当保护环境、实施适当预防措施的基础”。²⁰⁰ 仲裁员还指出，这一情况“不仅符合西班牙法律，而且还越来越符合国际法”。²⁰¹

152. 在莱茵铁路公司案仲裁中，法庭指出，“由于莱茵铁路公司铁路线的预定用途，必须采取保护环境措施，重新启用该公司铁路的问题不能与这些措施分开看。这些环保措施将会充分纳入项目及项目费用。”²⁰² 该案件支持根据国际法规定一项普遍性的环境影响评估要求，同时强调预防义务的日益重要性。据称，国际法委员会之前的工作“也普遍”强调环境影响评估要求。²⁰³

153. 国际法协会国际法尽职调查研究组 2014 年第一份报告指出，环境影响评估可以成为一国执行尽职调查准则的一个办法。²⁰⁴

5. 尽责

154. 尽责是国际法中的一个多方面概念，既适用于和平时期，也适用于武装冲突局势。大量的判例法都提到了“尽责”，²⁰⁵ 尽责的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前。尽责义务的实质内容广泛，适用于国际法的多个领域。例如，尽责义务不仅仅限于涉及一国境内外国人的情况，还适用于国际投资法和人权法，甚至适用于武装冲突法律。

155. 正是尽责的这一多层面性使得国际法协会成立了一个尽责问题研究小组。目的是“审议适用尽责概念的国际法各特定领域在多大程度上达成了共识。”²⁰⁶

¹⁹⁹ Olufemi Elias,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载于 Research Handbook o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Malgosia Fitzmaurice, David M.Ong 和 Panos Merkouris 编辑,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0), 第 227 页。

²⁰⁰ *Emilio Agustin Maffezini v. Kingdom of Spain*, 2001, ICSID Case No ARB/97/7, 2001 年 1 月 31 日[[矫正裁决日]送交当事方第 67 段。

²⁰¹ 同上。

²⁰² *Iron Rhine(Ijzeren Rijn)Railway(Belgium v.Netherlands)*案仲裁裁决, 2005 年 5 月 24 日,《国际仲裁裁决汇编》,第二十七卷,第 35 至 125 页,第 223 段。

²⁰³ 《2001 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关于预防危险活动所致跨界损害的条款草案第 7 条评注第 4 段,第 158 页。

²⁰⁴ 国际法协会,国际法尽职调查研究组,第一次报告,Duncan French(主席)和 Tim Stephens(报告员),2014 年 3 月 7 日,p 第 28 页。

²⁰⁵ 特别报告员之后还会再提到这一问题。

²⁰⁶ 国际法协会,国际法尽职调查研究组,第一次报告,第 17 页。

156. 正如国际法委员会之前在关于预防危险活动所致跨界损害的条款草案的工作中和国际法协会尽责问题研究小组已经指出的那样，尽责准则是一项行为义务，而不是一项结果义务。²⁰⁷ 在此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国际海洋法法庭在其海底采矿咨询意见中认定，采取预防风险措施是尽责的一部分。²⁰⁸

十二. 人权与环境

157. 人们常常强调，人无法在退化的环境中享受人权。但也并不是说自动存在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规定了一项具体的清洁环境人权。清洁环境和享受人权之间的联系是间接的，是通过健康权、食物权及可接受的生活条件权等其他既定权利实现的。²⁰⁹

158. 若干区域审查了环境法和国际人权法之间的关系。从以下的例子可以看出，若干区域文书和人权机构中处理人权规范的方式表明，此类规范与本专题存在潜在的相关性。

159. 例如，《欧洲人权公约》中没有明文规定保护环境的普遍性权利，但在其他权利中提到了环境问题。²¹⁰ 例如，欧洲人权法院曾指出，某些行为构成侵犯生命权或健康权的行为，并侵犯个人住宅和个人私人生活与家庭生活应受尊重的权利。²¹¹

160. 《欧洲人权公约》也没有明文规定个人享有清洁环境的权利，但《欧洲人权公约》的其他条款能够实现类似的结果。欧洲人权法院多次认定，各国应采取合理和适当环境保护措施的积极义务²¹² 可以说，这些义务与预防和防范原则体现的义务

²⁰⁷ 同上，第 17 页。

²⁰⁸ 国际海洋法法庭，第 17 号案，担保个人和实体从事“区域”内活动的国家所负责任和义务(向海底争端分庭提交的咨询意见申请)，2011 年 2 月 1 日咨询意见，第 131 段。

²⁰⁹ 但另见《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和《美洲人权公约关于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领域的附加议定书》(圣萨尔瓦多议定书这些公约编纂了这些所谓第三代权利，将其称为集体权利：《非洲宪章》第 24 条规定，“所有人民都有享有有利于其发展的一般令人满意的环境”。见 1981 年 6 月 27 日在班珠尔通过并于 1986 年 10 月 21 日生效的《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可查阅 www.achpr.org/files/instruments/achpr/banjul_charter.pdf。因此，提到的显然是“人民”，而不是个人。然而，享受这一权利的却是群体(人民)中的个人。而且，《美洲人权公约关于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领域的附加议定书》第 11 条规定，个人有权“享有健康环境”，国家也有义务“促进保护、养护和改进环境”。见《圣萨尔瓦多议定书》，可查阅 www.oas.org/juridico/english/treaties/a-52.html。

²¹⁰ *Di Sarno and Others v. Italy*, 10 January 2012, Judgement, Application No. 30765/08, para. 80; *Kyrtatos v. Greece*, 22 May 2003, Judgement, Application No. 41666/98, ECHR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2003-VI (摘录), para.52。

²¹¹ *Lopez Ostra v. Spain*, 9 December 1994, Judgement, Application No. 16798/90, ECHR Series A, No. 303-C; *Guerra and Others v. Italy*, 19 February 1998, Judgement, Application No.14967/89, ECHR Reports 1998-I。

²¹² *Băcilă v. Romania*, 30 March 2010, Judgement, Application No. 19234/04, ECHR Series 2009/11, para.60。 *Di Sarno and Others v. Italy*, 10 January 2012 年, Judgement, Application No. 30765/08, para. 80。

相似。关于各国赞赏这一点的程度，存在截然不同的意见，这只能从具体案件中推断。²¹³ 但公认的是，各国必须平衡社区在环境目标方面的总体利益与个人权利。²¹⁴

161. 此外，美洲体系内的一些决定提到向有关民众披露信息。披露信息义务²¹⁵源于人权法，而尽责原则的程序内容中很好地反映了披露信息义务。²¹⁶ 与公众协商要求本身就包含了披露信息义务。美洲体系内(法院或委员会)与环境有关的决定提到了美洲人民享有的一系列权利，例如财产权、行动和居所自由权、人道待遇权、司法保障权以及司法保护权。²¹⁷ 在尽可能地研究这些裁决后发现，这些裁决似乎并没有含蓄地提到环境法的原则。

162. 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委员会在奥戈尼兰德案中的来文²¹⁸ 明确规定，各国的义务采取合理措施防止破坏环境。除有义务避免直接参与污染空气、水和土壤外，非洲委员会的来文还概述了有义务使人民免受环境伤害。²¹⁹ 来文强调必须落实下列措施，以实现健康权和清洁环境权。这些措施包括：“对受到威胁的环境进行独立的科学监测”；在任何“重大工业开发”之前进行公共环境和社会影响研究；进行监测并向受到有害材料和活动影响的社区提供信息”。²²⁰ 重要的是，奥戈尼兰德案件中的这些要求与环境法环境影响评估的要求几乎相同。

163. 事实上，人权的法律性质与国际环境法的规范不同，因此很难对二者进行简单的比较。也就是说，人权保障那些属于个人的权利，而国际环境法侧重的是国家间关系。²²¹ 这说明了为什么人权中很少提到环境法，即使在极少提到环境法的情形中，提到环境法的文字也往往是一笔带过。

²¹³ *Hatton and others v. United Kingdom*, 8 July 2003, Application No. 36022/97, Judgement, 8 July 2003, para. 86, ECHR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2003-VIII.

²¹⁴ *Lopez Ostra v. Spain*, 9 December 1994, Judgement, Application No. 16798/90, ECHR Series Apara.51; *Hatton and Others v. UK*(Third Section), 2 October 2001, Judgement, Application No.36022/97, ECHR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2003-VIII, paras.96-97。另见 *Balmer-Schafroth and Others v. Switzerland*, 26 August 1997, Judgement, Application No.22110/93。Dissenting Opinion of judge Pettiti, joined by judges Gălcăklü, Walsh, Russo, Valticos, Lopes Rocha and Jambrek, as mentioned supra.

²¹⁵ *Guerra and Others v. Italy*, 19 February 1998, Judgement, Application No.14967/89, para. 60.

²¹⁶ 国际法协会，国际法尽职调查研究组，第 28 页。

²¹⁷ 例如见人权与环境问题独立专家 John H.Knox 收集的区域裁决，可查阅 <http://ieenvironment.org/regional-decisions>。

²¹⁸ 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委员会，*Communication 155/96,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Rights Action Center (SERAC) and Center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Rights (CESR) v. Nigeria*, 27 May 2002。

²¹⁹ 同上，第 50 段。

²²⁰ 同上，第 53 段。

²²¹ 国际法协会尽职调查研究组在其第一次报告第 14 段以下述方式叙述其区别：“国际人权法与国际法多数其他领域的区别是，国际人权法主要涉及各国国内事务。在国际环境法等其他领域，由于主权原则，各国国内事务基本不受审查，这些领域关注的重点是跨界(国际间)道义或物质伤害”。

土著人民和环境权利

164. 土著人民与他们的传统土地有着特殊关系。他们根据自己的传统价值观、愿景、需要和优先事项形成了自己不同的发展观。²²² 他们的祖传土地对于他们作为土著人民的集体实体存在和文化流传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²²³ 事实上，生物多样性受到最大、最多威胁的 200 块区域中 95% 为土著社区，这说明了土著人民和其土地之间的关系。²²⁴

165. 土著人民的权利源于“认识到他们与环境的特殊关系，这一关系对于他们作为独特民族生存的重要性，这一关系将他们与其他人区别开来，并需要特殊的法律地位。”²²⁵ 若干条约和文书以及判例法确认了土著人民的权利。²²⁶

166. 土著人民可能更容易受到武装冲突的影响。因此，必须指出的是，国际劳工组织第 169 号公约(1989 年)第 16 条²²⁷ 明确提到了土著人民流离失所问题。²²⁸ 第 16(1)条制定了该《公约》最重要规则之一，该条规定，不得将土著人民迁离其土地。这是应在所有正常情况下适用的一条基本原则，不过，应承认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不得不将他们迁走，在这些情况下，应仅仅将此作为一项不得已的措施。²²⁹ 在必须搬迁的情况下，一旦不得不离开的理由不再有效，土著人民就应有权返回。²³⁰ 例如，在发生战争或自然灾害的情况下，一旦战争或自然灾害结束，他们就应可以返回家园。一旦此类不可避免的迁移变成一个永久情况，那么土著人民除对他们

²²² 土著问题常设论坛，“谁是土著人？”，概况介绍，可查阅 www.un.org/esa/socdev/unpfii/documents/5session_factsheet1.pdf。

²²³ 同上。

²²⁴ Gonzalo Oviedo, Luisa Maffi 和 Peter Bille Larsen, *Indigenous and Traditional Peoples of the World and Ecoregion Conservation,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Conserving the World's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Diversity*, (Gland, 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 2000), 可查阅 www.terralingua.org/wp-content/uploads/downloads/2011/01/EGinG200rep.pdf。

²²⁵ Roger Plant, *Land Rights and Minorities*, Minority Rights Group International Report 94/2 (London, Minority Rights Group, 1994)。

²²⁶ 包括 1992 年 6 月 5 日巴西里约热内卢《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760 卷,第 30619 号)、1966 年 12 月 16 日纽约《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见第 2200 A(XXI)号决议,附件)、《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和《21 世纪议程》(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1992 年,里约热内卢,1992 年 6 月 3 日至 14 日, A/CONF.151/26/Rev.1 (Vol. I))、《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者权利宣言》(大会在第 47/135 号决议中通过)和《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大会在第 61/295 号决议中通过)。

²²⁷ 《1989 年土著和部落人民公约》(第 169 号),该公约修订《1957 年土著及部落人口公约》(第 107 号)。

²²⁸ 国际劳工组织,《土著和部落人民权利实践:国际劳工组织第 169 号公约指南》(日内瓦,2009 年),第 97 和 98 段。

²²⁹ 第 169 号公约,第 16(2)条。

²³⁰ 同上,第 16(3)条。

之前占有的土地拥有法律权利外，还有权获得同等质量的土地。其中可以包括与土地农业潜力相关的权利和在法律上承认拥有那块土地的权利。²³¹

十三. 今后工作方案

167. 第二份报告将重点讨论国际和非国际武装冲突中适用的法律。第二份报告将更详细地讨论本报告只简要谈到的某些方面，包括与本主题相关的人权和土著权利问题。第二份报告既会分析被认为与本主题相关的任何武装冲突现有规则，也会分析这些规则与和平时期适用的相关法律的关系。第二份报告的性质将与本报告不同。因为其中将提出准则提案(结论和建议)，因此很可能将进行更多分析而且更加具体。第三份报告(2016 年)将重点讨论冲突后措施，其中可能将提出数量有限的准则、结论或建议。

168. 特别报告员在 2013 年的发言中预想，时间框架为三年，在这期间，每年提交一份报告供委员会审议。特别报告员认为，这一时间框架是现实可行的，但前提是工作成果采取准则、结论或建议的形式。

169. 关于准则(结论/建议)本身的内容，特别报告员打算在第二份报告中建议，除其他外，准则(结论/建议)应涉及一般原则、预防措施、合作、在武装冲突期间继续适用的国际法规则案例以及保护海洋环境。第三份报告将提出冲突后措施建议，包括开展合作、分享信息和最佳做法以及补救措施。

170. 特别报告员认为，这一工作计划是可取的。人们日益关切在武装冲突情况下开展的活动对环境的影响，该工作计划将使国际法委员会全面了解这些关切带来的法律挑战。最重要的是，它将创造有利条件，协助国际法委员会得出适当结论，建议切实可行的准则。

171. 如果因所开展的工作需要继续加强逐渐发展和编纂工作，那么需要国际法委员会或各国在稍后阶段做出决定。这一做法似乎过于谨慎，甚或是缺乏雄心，但绝不能低估小步慢行的影响。此外，这完全属于国际法委员会章程第 1 条的范围，即国际法委员会“以促进国际法的逐步发展和编撰为宗旨”。

172. 特别报告员承认，国际法委员会和大会对于工作的最终结果表达了不同意见，最终结果尚待决定。虽然特别报告员表达了她的初步看法，但仍在等待国际法委员会今后做出决定。²³²

173. 特别报告员将继续与红十字委员会、教科文组织和环境署等其他实体以及与各区域组织磋商。但如果国际法委员会能再次请求各国提供实例，说明国际环

²³¹ 同上，第 16(4)条。

²³² A/68/10，第 143 段。

境法规则、包括区域和双边条约的规则在国际或非国际武装冲突中继续适用的情况，则会非常有助益。此外，如果各国能提供实例，说明与该专题相关的国家法律和适用了国际或国内环境法的判例，也会很有帮助。

附件

参考文献

- Abascal, Christine Stockins. Protección del medio ambiente en los conflictos armados. Dissertation. Pontificia Universidad Católica de Chile, 2009.
- Ajibola, Bola.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n times of armed conflict. In *International Legal Issues Arising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Decade of International Law*, Najeeb Al-Nauimi and Richard Meese, eds.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95.
- Almond, Harry H., Jr. The use of the environment as an instrument of war.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vol. 2, No. 1 (1991), pp. 455-468.
- Alston, Philip, Jason Morgan-Foster, and William Abresch. The competence of the UN Human Rights Council and its special procedures in relation to armed conflicts: extrajudicial executions in the “War on Terror”.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9, No. 1 (2008), pp. 183-209.
- Anderson, Terry L., and J. Bishop Grewell. The greening of foreign policy. *PERC Policy Series*, vol. 20, 2000.
- Antoine, Philippe. Droit international humanitaire et protection de l’environnement en cas de conflit armé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la Croix-Rouge*, vol. 74, No. 798 (1992), pp. 537-558.
- Anton, Donald K., and Dinah L. Shelt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Human Righ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 Arraiza Navas, Fermín Luís, and Pedro J. Varela Fernández. Vieques: prácticas de guerra, derechos humanos y ambiente. *Revista Jurídica Universidad de Puerto Rico*, vol. 70, No. 1 (2001), pp. 209-233.
- Asociación Española de Profesores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 y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Problemas Internacionales del Medio Ambiente: VIII Jornadas, Barcelona, 2 a 5 de julio de 1984*. Bellaterra, Barcelona: 1985.
- Austin, Jay. *Conflict-Environment: Questions over Accountability in Kosovo*. Geneva: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November 1999.
- Austin, Jay, and Carl E. Bruch, eds. *The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War: Legal, Economic, and Scientific Perspectiv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Baker, Betsy. Legal protections for the environment in times of armed conflict. *Virgi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33, No. 2 (1993), pp. 351-383.
- Banerjee, Rishav. Destruction of environment during an armed conflict and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a legal analysis. In *Asi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5. B. S. Chimni, M. Masahiro and J. Rehman, eds. London: Routledge, 2009, pp. 145-188.
- Barboza, Julio. *The Environment, Risk and Liability in International Law*. Leide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11.
- Barned, Ashley, and Christopher Waters. The Arctic environment and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In *Canadi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49, J. H. Currie and R. Provost, eds.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11, pp. 213-241.

Bassiouni, M. Cherif. International crimes: *jus cogens* and *obligatio erga omnes*.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vol. 59, No. 4 (1996), pp. 63-74.

Ben Mahfoudh, Haykel. *L'environnement, l'humanitaire et le droit international*. Tunis: Centre des publication universitaire, 2010.

Birnie, Patricia, Alan Boyle, and Catherine Redgewell.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Environ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Blattmann, Heidi. Environmental damage from the Gulf war. *Swiss Review of World Affairs*, vol. 42, No. 3 (1992), pp. 27-28.

Blishchenko, Igor P., and Vladimir P. Shavrov. The legal basis of claims for damage to the environment resulting from military action. *Österreichische Zeitschrift für öffentliches Recht und Völkerrecht*, vol. 40, No. 1 (1989), pp. 29-45.

Blom, Esther, and others, eds. *Nature in Wa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during Conflict*. Leiden: Nederlandse Commissie voor Internationale Natuurbescherming, 2000.

Bodansky, Daniel. *Legal Regulation of the Effects of Military Activity on the Environment*. Berlin, Erich Schmidt Verlag, 2003.

Bodansky, Daniel, Jutta Brunnée, and Ellen Hey. *The Oxford Handbook o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Boelart-Suominen, Sonja Ann Joze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and Naval War: The Effect of Marine Safety and Pollution Conventions during 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 Newport Paper, No. 15. Newport: Naval War College, 2000.

Booley, Ashraf, and Letetia van der Poll. In our common interest: liability and redress for damage caused to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during armed conflict. *Law,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vol. 15, 2011, pp. 90-129.

Bothe, Michael. The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n times of armed conflict: legal rules, uncertainty, deficiencies and possible developments. *Germ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34, 1991, pp. 54-62.

_____.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n times of armed conflict. In *International Legal Issues Arising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Decade of International Law*, Najeeb Al-Nauimi and Richard Meese, eds.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95.

Bothe, Michael, and others.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n Times of Armed Conflict*. Report to the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SJ/110/85. 1985.

Bothe, Michael, and others. International law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during armed conflict: gaps and opportunitie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 92, No. 879 (2010), pp. 569-592.

Bothe, Michael, Karl Josef Partsch, and Waldemar A. Solfal. *New Rules for Victims of Armed Conflicts: Commentary on the Two 1977 Protocols Additional to the Geneva Conventions of 1949*. 2nd ed.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13.

Bouvier, Antoine. La protection de l'environnement naturel en période de conflit armé.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la Croix-Rouge*, vol. 73, No. 792 (1991), pp. 599-611.

Bruch, Carl. *Constitu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Giving Force to Fundamental Principles in Africa*. 2nd ed. Washington, D.C.: Environmental Law Institute, 2007.

Bruch, Carl, and others. Post-conflict peace building and natural resources.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vol. 19, No. 1 (2008), pp. 58-96.

Bunker, Alice Louise.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during armed conflict: one Gulf, two wars. *Review of European Community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vol. 13, No. 2 (2004), pp. 201-213.

Bächler, Günther, and Kurt R. Spillman, eds.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s a Cause of War: Country Studies of External Experts*. Chur-Zürich: Rüegger, 1996.

Caron, David D. Finding out what the oceans claim: the 1991 Gulf War, the marine environment, and the United Nations Compensation Commission. In *Bringing New Law to Ocean Waters*, David D. Caron and Harry N. Scheiber, eds. Leide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4.

Clément, Etienne. Le réexamen de la Convention de la Haye de 1954 pour la protection des biens culturels en cas de conflit armé. In *International Legal Issues Arising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Decade of International Law*, Najeeb Al-Nauimi and Richard Meese, eds.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95.

Cortina Mendoza, R., and V. Saco Chung. La protección del medio ambiente en 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humanitario. *Revista da Faculdade de Direito da UFMG*, vol. 51, 2007, pp. 255-277.

Crawford, Alex, and Johannah Bernstein. *MEAs, Conservation and Conflict: A Case Study of Virunga National Park, DRC*. Winnipeg: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08.

Crawford, Emily. Armed conflict, international. In *Max Planck Encyclopa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vol. I, Rüdiger Wolfrum,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Dam-de Jong, Daniëla. From engines for conflict into engin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potential of international law to address predatory exploit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situations of internal armed conflict. *Nordic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82, No. 1 (2013), pp. 155-178.

_____. International law and resource plunder: the protec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during armed conflict.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vol. 19, No. 1 (2008), pp. 27-57.

Das, Onita.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ecurity and Armed Conflict: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3.

_____.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armed conflict: filling the gaps wit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ordic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82, No. 1 (2013), pp. 103-128.

D'Aspremont, Jean. Towards an international law of brigandage: interpretative engineering for the regul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 exploitation. *As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3, No. 1 (2013), pp. 1-24.

Debonnet, Guy, and Kes Hillman-Smith. Supporting protected areas in a time of political turmoil: the case of world heritage sites in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Parks*, vol. 14, No. 1 (2004), pp. 9-16.

De Sadeleer, Nicolas. *EU Environmental Law and the Internal Marke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Desch, Thomas. Haftung für Umweltschäden im Krieg: einige Bemerkungen zu I. P. Blishchenko und V. Ph. Shavrov. *Österreichische Zeitschrift für öffentliches Recht und Völkerrecht*, vol. 40, No. 1 (1989), pp. 47-71.

Desgagné Richard. The prevention of environmental damage in time of armed conflict: proportionality and precautionary measures.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vol. 3, 2000, pp. 109-129.

Domínguez-Matés, Rosario. Desafío para 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humanitario: responsabilidad penal internacional del individuo por daños al medio ambiente durante un conflicto armado. *America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vol. 20, 2004, pp. 43-63.

_____. New weaponry technologies and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their consequences on the human being and the environment. In *The New Challenges of Humanitarian Law in Armed Conflicts: In Honour of Professor Juan Antonio Carrillo-Salcedo*, Pablo Antonio Fernández-Sánchez, ed. Leide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5.

Dorsey, Jessica. Conference notes on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n armed conflict: testing the adequacy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 Hague: T.M.C. Asser Instituut, 7 November 2011.

Dorsouma, Al-Hamandou, and Michel-André Bouchard. Conflits armés et environnement. *Développement durable et territoires*, vol. 8, 2006.

Douhan, Alena. Liability for environmental damage. In *Max Planck Encyclopa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vol. VI, Rüdiger Wolfrum,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Droege, Cordula, and Marie-Louise Tougas. The protection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n armed conflict — existing rules and need for further legal protection. *Nordic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82, No. 1 (2013), pp. 21-52.

DuBarry Huston, Meredith. Wartime environmental damages: financing the clean-up.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 23, No. 4 (2002), pp. 899-929.

Elias, Olufemi.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In *Research Handbook o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Malgosia Fitzmaurice, David M. Ong and Panos Merkouris, ed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0.

Eniang, Edem, Amleset Haile, and Teshale Yihdego. Impacts of landmines on the environment and biodiversity.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Law*, vol. 37, No. 6 (2007), pp. 501-504.

Falk, Richard. The inadequacy of the existing legal approach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wartime. In *The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War: Legal, Economic, and Scientific Perspectives*, Jay E. Austin and Carl E. Bruch, e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_____. Environmental disruption by military means and international law.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vol. 15, 2004, pp. 725-731.

Feliciano, Florentino P. Marine pollution and spoli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as war measures: a note on some international law problems in the Gulf War. *Houst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4, No. 3 (1992), pp. 496-497.

Fenrick, William J. The law applicable to targeting and proportionality after Operation Allied Force: a view from the outside.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vol. 3, 2000, pp. 53-80.

Fitzmaurice, Malgosia, David M. Ong, and Panous Merkouris, eds. *Research Handbook o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0.

Fleck, Dieter. Current legal and policy issues. In *Future Legal Restraints on Arms Proliferation: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Law*.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96.0.24.

_____. The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n armed conflict: legal obligations in the absence of specific rules. *Nordic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82, No. 1 (2013), pp. 7-20.

French, Dunc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Research Handbook o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Malgosia Fitzmaurice, David M. Ong and Panos Merkouris, ed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0.

Gardam, Judith G. Energy and the law of armed conflict. *Journal of Energy and Natural Resources Law*, vol. 15, No. 2 (1997), pp. 87-96.

Gasser, Hans-Peter. For better protection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n armed conflict: a proposal for a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89, No. 3 (1995), pp. 637-640.

Gehring, R. La protection de l'environnement en période de conflit armé: que peut ou pourrait apporter la Cour pénale internationale. Université de Lausanne, 2001.

Goldblat, Jozef. Legal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against the effects of military activities. *Bulletin of Peace Proposals*, vol. 22, No. 4 (1991), pp. 399-406.

_____. The mitigation of environmental disruption by war: legal approaches. In *Environment Hazards of War: Releasing Dangerous Forces in an Industrialized World*, Arthur H. Westing, ed. London: Sage, 1990.

_____. Protection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gainst the effects of military activities: legal implications. *Humanitäres Völkerrecht: Informationsschriften*, vol. 3, 1992, pp. 133-136.

Green, Leslie.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law of conventional warfare. In *Canadi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9, C. B. Bourne, ed.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91.

Greenwood, Christopher. State responsibility and civil liability for environmental damages caused by military operations. In *International Law Studies*, vol. 69,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During Armed Conflict*, Richard J. Grunawalt, John E. King and Ronald S. McClain, eds. Newport: Naval War College, 1996.

Gillespie, Alexander. *Conservation, Biodiversity and International Law*.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1.

Guarnacci, Emilia Schiavo. *Conflictos armados y medio ambiente*. Buenos Aires, Universidad de Salvador, 2006.

Guillard, David. *Les armes de guerre et l'environnement naturel: essai d'étude juridique*. Paris: Harmattan, 2006.

Hagmann, Tobias. Confronting the concept of environmentally induced conflict. *Peace, Conflict and Development*, vol. 6, 2005, pp. 1-22.

Halle, Silja, ed. *From Conflict to Peacebuilding: The Role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 Nairobi: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February 2009.

Harwell, Emily E. Building momentum and constituencies for peace: the role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transitional justice and peacebuilding. In *Governance, Natural Resources, and Post-conflict Peacebuilding*, Carl Bruch, Carroll Muffet and Sandra S. Nichols, eds. Routledge, 2013.

Hawley, T. M. *Against the Fires of Hell: The Environmental Disaster of the Gulf Wa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92.

Heintschel von Heinegg, Wolff, and Michael Donner. New developments in the protection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n naval armed conflicts. In *Germ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37, Jost Delbrück, Rainer Hofmann and Andreas Zimmermann, eds. Berlin: Duncker and Humblot, 1994, pp. 281-302.

Herczegh, Géza. La protection de l'environnement naturel et le droit humanitaire. In *Etudes et essais sur le droit international humanitaire et sur les principes de la Croix-Rouge en l'honneur de Jean Pictet*.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84.

Henckaerts, Jean-Marie. International legal mechanisms for determining liability for environmental damage under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In *The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War: Legal, Economic, and Scientific Perspectives*, Jay E. Austin and Carl E. Bruch, e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Huang, Ling-Yee. The 2006 Israeli-Lebanese conflict: a case study for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n times of armed conflict. *Florid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0, No. 1 (2008), pp. 103-113.

Hourcle, Laurent R. Environmental law of war. *Vermont Law Review*, vol. 25, No. 3 (2001), pp. 653-681.

Hulme, Karen. Taking care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against damage: a meaningless obligatio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 92, No. 879 (2010), pp. 675-691.

_____. *War Torn Environment: Interpreting the Legal Threshold*. Leide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4.

Jensen, David. Evaluating the impact of UNEP's post-conflict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s. In: *Assessing and Restoring Natural Resources in Post-Conflict Peacebuilding*, David Jensen and Steve Lonergan, eds. Abingdon, Oxon: Earthscan, 2013.

Jensen, David, and Silja Halle, eds. *Greening the Blue Helmets: Environment, Natural Resources and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Nairobi: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May 2012.

_____.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During Armed Conflict: An Inventory and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Law*. Nairobi: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November 2009.

Jensen, Eric Talbot.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environmental warfare: active and passive damage during times of armed conflict. *Vanderbilt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vol. 38, No. 1 (2005), pp. 145-186.

Jensen, Eric Talbot, and James J. Teixeira, Jr. Prosecuting members of the U.S. military for wartime environmental crimes. *Georgetow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Review*, vol. 17, No. 4 (2005), pp. 651-671.

Joyner, Christopher C., and James T. Kirkhope. The Persian Gulf war oil spill: reassessing the law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the law of armed conflict. *Case Western Reserv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4, No. 1 (1992), pp. 29-62.

Juste Ruiz, Jos é Derecho de los conflictos armados y protecci3n del medio ambiente. In *Estudios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 en homenaje al profesor Ernesto J. Rey Caro*, vol. 2, Zlata Drnas de Cl ément, ed. C3rdoba: Marcos Lerner, 2002.

_____. Derecho de los conflictos armados y protecci3n del medio ambiente. In *Cursos de derechos humanos de Donostia-San Sebasti3n*, vol. 3, Juan Soroeta Liceras, ed. San Sebasti3n: Universidad del Pa í Vasco, 2002.

Karuru, Njeri, and Louise H. Yeung. Integrating gender into post-conflict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In *Governance, Natural Resources, and Post-conflict Peacebuilding*, Carl Bruch, Carroll Muffet and Sandra S. Nichols, eds. Routledge, 2013.

Kearns, Brendan. When bonobos meet guerillas: preserving biodiversity on the battlefield. *Georgetow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Review*, vol. 24, No. 2 (2012), pp. 123-168.

Kellman, Barry. The Chemical Weapons Convention: a verification and enforcement model for determining legal responsibilities for environmental harm caused by war. In *The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War: Legal, Economic, and Scientific Perspectives*, Jay E. Austin and Carl E. Bruch, e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Kirchner, A.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time of armed conflict. *Europea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Law Review*, vol. 9, No. 10 (2000), pp. 266-272.

Kiss, Alexandre.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the environment.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Law*, vol. 31, Nos. 4-5 (2001), pp. 223-231.

Knox, John H. Assessing the candidates for a global treaty on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New York University Environmental Law Journal*, vol. 12, No. 1 (2003), pp. 153-168.

Koppe, Erik V. The principle of ambiguity and the prohibition against excessive collateral damage to the environment during armed conflict. *Nordic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82, No. 1 (2013), pp. 53-82.

_____. *The Use of Nuclear Weapons and the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during 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 Oxford: Hart Publishing, 2008.

Koroma, Abdul G. Law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jurisprud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Changing Perceptions of Security*. Brill, forthcoming.

Landel, Morgane. Are aerial fumig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war in Colombia a violation of the rules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Transnational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vol. 19, No. 2 (2010), pp. 419-513.

Lanier-Graham, Susan D. *The Ecology of War: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Weaponry and Warfare*. New York: Walker, 1993.

- Lavaux, Stephanie. Degradación ambiental y conflictos armados: las conexiones. Documento de investigación, No. 7. Bogotá Centro Editorial, Universidad del Rosario, 2004.
- Lavieille, Jean-Marc. Les activités militaires, la protection de l'environnement et le droit international. *Revue juridique de l'environnement*, vol. 4, 1992, pp. 421-452.
- Lijnzaad, Liesbeth, and Gerard J. Tanja.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n times of armed conflict: the Iraq-Kuwait War. *Netherlands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vol. 40, No. 2 (1993), pp. 169-199.
- Lord, Janet E. Legal restraints in the use of landmines: humanitarian and environmental crisis. *California Western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vol. 25, No. 2 (1995), pp. 311-355.
- Low, Luan, and David Hodgkinson. Compensation for wartime environmental damage: challenges to international law after the Gulf War. *Virgi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35, No. 2 (1995), pp. 405-483.
- Lubell, Noam. Challenges in applying human rights law to armed conflict.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 87, No. 860 (2005), pp. 737-754.
- Lujala, Päävi, and Siri Aas Rustad, ed. *High-value Natural Resources and Post-conflict Peacebuilding*. New York: Earthscan, 2012.
- Lundberg, Michael A. The plunder of natural resources during war: a war crime (?) *Georgetow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39, No. 3 (2008), pp. 495-525.
- Makhijani, Arjun, Howard Hu, and Katherine Yih, eds. *Nuclear Wastelands: A Global Guide to Nuclear Weapons Production and its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Effects — By a Special Commission of International Physicians for the Prevention of Nuclear War and the Institute for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Research*.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1995.
- Malviya, R. A. Laws of armed conflic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 analysis of their inter-relationship. In *ISIL Year Book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and Refugee Law*, vol. I. New Delhi: Indi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1.
- Marauhn, Thilo, Georg Nolte, and Andreas Paulus.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Human Rights Law Journal*, vol. 29, 2008, pp. 216-226.
- Marauhn, Thilo, and Zacharie F. Ntoubandi. Armed conflict, non-international. In *Max Planck Encyclopa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vol. I, Rüdiger Wolfrum,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 Marsh, Jeremy. *Lex lata or lex ferenda?* Rule 45 of the ICRC study on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Military Law Review*, vol. 198, 2008, pp. 116-164.
- McCarthy, Conor. *Reparations and Victim Support in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 McNeill, John H.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n times of armed conflic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military practice. In *Hague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6, 1993, A.-C. Kiss and Johan G. Lammers, eds. Dordrecht: Martinus Nijhoff, 1994.
- Melvin, Neil, and Ruben De Koning. Resources and armed conflict. In *SIPRI Yearbook 2011: Armaments, Disarmamen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Mensah, Thomas A. United Nations Compensation Commission (UNCC). In *Max Planck Encyclopa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vol. X, Rüdiger Wolfrum,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Mésa, R. Protection de l'environnement et armes de combat: étud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enal. *Revue trimestrielle des droits de l'homme*, vol. 85, 2011, pp. 43-57.

Mollard-Bannelier, Karine. *La protection de l'environnement en temps de conflit armé*. Paris: Pedone, 2001.

Momtaz, Djamchid. Les règles relatives à la protection de l'environnement au cours des conflits armés à l'épreuve du conflit entre l'Irak et le Koweït. *Annuaire françai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vol. 37, 1991, pp. 203-219.

Murphy, Sean D., Won Kidane, and Thomas R. Snider. *Litigating War: Arbitration of Civil Injury by the Eritrea-Ethiopia Claims Commiss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Nafziger, James A. R. UNESCO-centered management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over cultural property. *Hastings Law Journal*, vol. 27, No. 5 (1976), pp. 1051-1067.

Okorodudu-Fubara, Margaret. Oil in the Persian Gulf War: legal appraisal of an environmental warfare. *St. Mary's Law Journal*, vol. 123, 1992, pp. 204-206.

Okowa, Phoebe. Environmental justice in situations of armed conflict. In *Environmental Law and Justice in Context*, Jonas Ebbesson and Phoebe Okowa, e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_____. The legal framework for the protec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situations of armed conflict. In *Criminal Jurisdiction 100 Years after the 1907 Hague Peace Conference: 2007 Hague Joint Conference on Contemporary Issues of International Law*, W.J.M. van Genugten, M. P. Scharf and S. E. Radin, eds. The Hague: T.M.C. Asser, 2007.

Oviedo, Gonzalo, Luisa Maffi, and Peter Bille Larsen. *Indigenous and Traditional Peoples of the World and Ecoregion Conservation: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Conserving the World's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Diversity*. Gland: 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 2000.

Özerdem, Alpaslan, and Rebecca Roberts, eds. *Challenging Post-conflict Environments: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Burlington, Vermont: Ashgate, 2012.

Parsons, Rymn James. The fight to save the planet: U.S. Armed Forces, "greenkeeping," and enforcement of the law pertaining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uring armed conflict. *Georgetow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Review*, vol. 10, No. 2 (1998), pp. 441-500.

Pavoni, Riccardo. Environmental righ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investor-State case law: a critical appraisal. In *Human Right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Arbitration*, Pierre-Marie Dupuy, Ernst-Ulrich Petersmann and Francesco Francioni, e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ayne, Cymie R., and Peter H. Sand, eds. *Gulf War Reparations and the UN Compensation Commission: Environmental Liabi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eterson, Ines.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n times of armed conflict: a concern for international war crimes law? *Leid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2, No. 2 (2009), pp. 325-343.

Pimiento Chamorro, Susana, and Edward Hammond. *Addressing Environmental Modification in Post-Cold War Conflict: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ohibition of Military or Any Other Hostile Use of Environmental Modification Techniques (ENMOD) and Related Agreements*. Edmonds, Washington: Edmonds Institute, 2001.

Plant, Glen, e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the Law of War: A "Fifth Geneva"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n Time of Armed Conflict*. London: Belhaven Press, 1992.

Plant, Roger. *Land Rights and Minorities*. Minority Rights Group International Report 94/2. London: Minority Rights Group, 1994.

Popović, Neil A. F. Humanitarian law,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and human rights. *Georgetow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Review*, vol. 8, No. 1 (1995), pp. 67-89.

Prescott, Michael. How war affects treaties between belligerents: a case study of the Gulf War. *Emory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vol. 7, No. 1 (1993), pp. 197-201.

Quénivet, Noële and Shilan Shah-Davis, eds. *International Law and Armed Conflict: Challenges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Hague: T.M.C. Asser, 2010.

Quinn, John P., Richard T. Evans, and Michael J. Boock, United States Navy development of operational-environmental doctrine. In *The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War: Legal, Economic, and Scientific Perspectives*, Jay E. Austin and Carl E. Bruch, e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Reuveny, Rafael, Andreea S. Mihalache-O'Keef, and Quan Li. The effect of warfare on the environmen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7, No. 6 (2010), pp. 749-761.

Rich, Andy. The environment: adequacy of protection in times of war. *Penn State Environmental Law Review*, vol. 12, No. 3 (2004), pp. 445-558.

Robb, Cairo A. R., e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Reports*, vol. 3, *Human Rights and Enviro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Roberts, Adam. The law of war and environmental damage. In *The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War: Legal, Economic, and Scientific Perspectives*, Jay E. Austin and Carl E. Bruch, e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Robinson, Nicholas.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destruction of nature in the Gulf War.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Law*, vol. 21, 1991, pp. 216-220.

Roscini, Marco. Protection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n time of armed conflict. In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 Anthology*, Jahid Hossain Bhuiyan, Louise Doswald-Beck and Azizur Rahman Chowdhury, eds. Nagpur: LexisNexis Butterworths, 2009.

Roselli, Carina. Restoring Iraq's southern marshes: uncertainty in post-conflict Mesopotamia. Dissertation. Vermont Law School, 20 December 2012.

Roselli, Carina. Bordering on desuetude: are Additional Protocol I's environmental provisions no longer serviceable? 17 January 2013. The article is on file with the Special Rapporteur.

Ross, Marc A. Environmental warfare and the Persian Gulf War: possible remedies to combat intentional destru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Dickins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0, No. 3 (1992), pp. 515-534.

Saalfeld, Michael. Umweltschutz in bewaffneten Konflikten aus völkerrechtsgeschichtlicher Sicht. *Humanitäres Völkerrecht: Informationsschriften*, vol. 5, No. 1 (1992), pp. 23-32.

Sand, Peter H. Compensation for environmental damage from the 1991 Gulf War.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Law*, vol. 35, No. 6 (2005), pp. 244-249.

_____. Environmental dispute settlement and the experience of the UN Compensation Commission. *Japanese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54, 2011, pp. 151-189.

Sands, Philippe. The Gulf war: environment as a weapon. In *Proceedings of the 85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85, G. C. Denny and S. F. Bassuener, eds. Washington, D.C.: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1991.

_____. Liability for environmental damage and the report of the UNEP Working Group of Experts: an introductory note. In *Liability and Compensation for Environmental Damage: Compilation of Documents*, Alexandre Timoshenko, ed. Nairobi: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1998.

_____.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Schafer, Bernard K.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rnational laws of armed conflic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need to re-evaluate what types of conduct are permissible during hostilities. *California Western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vol. 19, No. 2 (1988-1989), pp. 287-325.

Schiefer, H. Bruno, ed. *Verifying Obligations Respecting Arms Control and the Environment: A Post-Gulf War Assessment — Final Report, Workshop on Verifying Obligations Respecting Arms Control and the Environment: Post-Gulf War Assessment*. Saskatoon: 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 1992.

Schmitt, Michael N. Green war: an assessment of the environmental law of 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 *Y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2, No. 1 (1997), pp. 1-109.

_____. War and the environment: fault lines in the prescriptive landscape. In *The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War: Legal, Economic, and Scientific Perspectives*, Jay E. Austin and Carl E. Bruch, e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_____. Humanitarian law and the environment. *Denve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cy*, vol. 28, No. 3 (2000), pp. 265-323.

Schwartz, Priscilla. The polluter-pays principle. In *Research Handbook o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Malgosia Fitzmaurice, David M. Ong and Panos Merkouris, ed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0.

Shambaugh, James, Judy Oglethorpe, and Rebecca Ham. *The Trampled Grass: Mitigating the Impacts of Armed Conflict on the Environment*. Washington, D.C.: Biodiversity Support Program, 2001.

Sharp, Walter. The effective deterrence of environmental damage during armed conflict: a case analysis of the Persian Gulf War. *Military Law Review*, vol. 137, 1992, pp. 1-67.

Shelton, Dinah L., and Alexandre Charles Kiss.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3rd ed. New York: Transnational Publishers, 2004.

Singh, A. P. Protection of environment during armed conflict: is a new frame of laws necessary? *Journal of the Indian Law Institute*, vol. 52, Nos. 3-4 (2010), pp. 453-466.

Sjöstedt, Britta. The role of multilater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in armed conflict: “green-keeping” in Virunga Park — applying the UNESCO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 in the armed conflict of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Nordic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82, No. 1 (2013), pp. 129-153.

Smith, Tara. Creating a framework for the prosecution of environmental crimes i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In *The Ashgate Research Companion to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Critical Perspectives*, William A. Schabas, Yvonne McDermott and Niamh Hayes, eds. Farnham, Surrey: Ashgate, 2013.

Spieker, Heike. The conduct of hostilities and the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n *Frieden in Freiheit — Peace in Liberty — Paix en liberté: Festschrift für Michael Bothe zum 70. Geburtstag*, Andreas Fischer-Lescano and others, eds. Zürich: Dike Verlag, 2008.

_____. *Völkergewohnheitsrechtlicher Schutz der natürlichen Umwelt im internationalen bewaffneten Konflikt*. Bochum: UVB-Universitätsverlag Dr. N. Brockmeyer, 1992.

Tarasofsky, Richard G. Legal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during 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 *Netherlands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4, 1993, pp. 17-79.

_____. Protecting especially important areas during 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 a critique of the IUCN draft convention on the prohibition of hostile military activities in internationally protected areas. In *The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War: Legal, Economic, and Scientific Perspectives*, Jay E. Austin and Carl E. Bruch, e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Thieffry, Patrick. *Droit de l'environnement de l'Union européenne*. 2nd. ed. Brussels: Bruylant, 2011.

Thomas, Carson. Advancing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n relation to armed conflict: Protocol I's threshold of impermissible environmental damage and alternatives. *Nordic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82, No. 1 (2013), pp. 83-103.

Ticehurst, Rupert. The Martens Clause and the laws of armed conflict.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 37, No. 317 (1997), pp. 125-134.

Tignino, Mara. Water,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 92, No. 879 (2010), pp. 647-674.

Tir, Jaroslav, and Douglas M. Stinnett. Weathering climate change: can institutions mitigate international water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9, No. 1 (2012), pp. 211-225.

Tolentino, Amado S., Jr. Armed conflict and the environment: legal perspectives. *Philippine Law Journal*, vol. 81, No. 3 (2007), pp. 377-389.

_____. The law of armed conflict vis-à-vis the environment. In *International Law: New Actors, New Concepts — Continuing Dilemmas: Liber Amicorum Boidar Bakoti?*, Budislav Vukas and Trpimir M. Šošić, eds. Leiden: Martinus Nijhoff, 2010.

Trouwborst, Arie. *Evolution and Status of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in International Law*.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and Policy Series, vol. 62. The Hague: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2.

Tucker, Matthew L. Mitigating collateral damage to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n naval warfare: an examination of the Israeli naval blockade of 2006. *Naval Law Review*, vol. 57, 2009, pp. 161-201.

Türk, Helmut. The negotiation of a new Geneva-style convention: a government lawyer's perspective.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the Law of War: A "Fifth Geneva"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n Time of Armed Conflict*, Glen Plant, ed. London: Belhaven Press, 1992.

Van der Vyver, Johan D. The environment: State sovereignty, human rights, and armed conflict. *Emory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vol. 23, No. 1 (2009), pp. 85-112.

Venturini, Gabriella. Disasters and armed conflict. In *International Disaster Response Law*, Andrea de Guttery, Marco Gestri and Gabriella Venturini, eds. The Hague: T.M.C. Asser, 2012.

_____. International disaster response law in relation to other branches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International Disaster Response Law*, Andrea de Guttery, Marco Gestri and Gabriella Venturini, eds. The Hague: T.M.C. Asser, 2012.

Verwey, Wil. Observation on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n times of 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 In *Hague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7, 1994, A.-C. Kiss and J. G. Lammers, eds. Dordrecht: Martinus Nijhoff, 1995.

_____.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n times of armed conflict: in search of a new legal perspective. *Leid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8, No. 1 (1995), pp. 7-40.

Vialle, Anne-Cécile, and others. Peace through justice? International tribunals and accountability for wartime environmental wrongs. In *Governance, Natural Resources, and Post-conflict Peacebuilding*, Carl Bruch, Carroll Muffet and Sandra S. Nichols, eds. Routledge, 2013.

Vinuales, Jorge E. Cartographies imaginaires: observations sur la portée juridique du concept de "regime special" en droit international. *Journal du droit international*, vol. 140, No. 2 (2013), pp. 405-425.

Voigt, Christin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 a Principle of International Law: Resolving Conflicts between Climate Measures and WTO Law*. Leiden: Martinus Nijhoff, 2009.

Vönelky, Silija. *Die Fortgeltung des Umweltvölkerrechts in internationalen bewaffneten Konflikten*. Beiträge zum ausländischen öffentlichen Recht und Völkerrecht, vol. 145, Max-Planck-Institut für ausländisches öffentliches Recht und Völkerrecht. Berlin: Springer, 2001.

_____. A new shield for the environment: peacetime treaties as legal restraints of wartime damage. *Review of European Community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vol. 9, No. 1 (2000), pp. 20-32.

_____. Peacetime environmental law as a basis of state responsibility for environmental damage caused by war. In *The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War: Legal, Economic, and Scientific Perspectives*, Jay E. Austin and Carl E. Bruch, e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Warner, Frederick. The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the Gulf War. *Environment*, vol. 33, No. 5 (1991), pp. 6-26.

Weiss, Edith Brown. *International Law for a Water-Scarce World*. Leide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13.

Westing, Arthur. *Ec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Second Indochina War*. Stockholm: Almqvist & Wiksell International, 1976.

_____. *Global Resources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Strategic Policy and A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_____. In furtherance of environmental guidelines for armed forces during peace and war. In *The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War: Legal, Economic, and Scientific Perspectives*, Jay E. Austin and Carl E. Bruch, e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_____. *Warfare in a Fragile World: Military Impact on the Human Environment*. London: Taylor and Francis, 1980.

Westing, Arthur, ed. *Explosive Remnants of War: Mitigating the Environmental Effects*. London: Taylor and Francis, 1985.

Whittemore, Luke. Intervention and post-conflict natural resource governance: lessons from Liberia. *Minnesot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7, No. 2 (2008), pp. 387-433.

Wyatt, Julian. Law-making at the intersection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humanitarian and criminal law: the issue of damage to the environment in 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 92, No. 879 (2010), pp. 593-646.

Zemmali, Ameer. La protection de l'environnement en période de conflit armé dans les normes humanitaires et l'action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 Rouge. In *International Legal Issues Arising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Decade of International Law*, Najeeb Al-Nauimi and Richard Meese, eds.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95.